



Title	略論古代龜茲文書製作傳統之萌蘗
Author(s)	慶, 昭蓉
Citation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 2018, 33, p. 45-75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71365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略論古代龜茲文書製作傳統之萌蘖

慶 昭 蓉*

1. 緒論

龜茲一名始見《漢書》⁽¹⁾。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翻爲庫車並沿用至今，然而古代龜茲地區至少包含現今庫車、沙雅、新和、拜城四縣，並可能包括輪臺縣（參見榮 1992）。當地出土可以確實繫年的文字資料中，以《劉平國碑》爲最早。該石刻鑿於“永壽四年（158）八月”（該年六月即已改延熹元年），茲綜合馬雍（1990）、朱玉麒（2017）所輯錄文如下：

（大件拓片部分）

- 1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以七月廿六日發家，
- 2 從秦人孟伯山、狄虎賁、趙當卑、夏羌、
- 3 石當卑、程阿羌等六人共來作列亭，從
- 4 □谷關，八月一日始斲山石作孔，至十日
- 5 止。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
- 6 子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 7 乙酉直建紀。此東烏累關城皆
- 8 將軍所作也。□披[後缺]

（小件拓片部分）

- 1 □□□□
- 2 淳于伯隗
- 3 作此誦。

馬雍將“羌”字均錄爲“姜”，視二字爲通假；朱玉麒取“羌”，從之（各家錄文匯纂參見陶 2014）。碑文不涉及特定發文對象，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官文書，然而記事公開，且具有官方性質，值得有關研究參考。其主事者明示於開頭而非首先提出國王名諱，年月日置於末尾，與西域南道 3、4

* 龍谷大學世界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客員研究員/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CHING Chao-jung, Visiting Researcher, Research Center for World Buddhist Cultures, Ryukoku University/Adjunct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1) 《漢書·地理志》上郡龜茲縣夾註云：“應劭曰：‘音丘慈。’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見《漢書》卷二八下，1962 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618 頁。又見服虔注《傅介子傳》，《漢書》卷七〇，3001 頁。

世紀佉盧文書慣例有別⁽²⁾。雖然我們難以僅憑此碑探討漢代龜茲是否以文書管理軍政或驛政，至少不妨判定漢文是該地流行文字之一（詳第三節）。

此碑之外，現今可以大致確定書寫於 7 世紀之前的龜茲官私文書全為胡語，它們絕大部分是木簡，語言則為龜茲語（吐火羅 B 語）抑或是西北印度俗語（又稱犍陀羅語）在當地的變體，本文姑且稱後者為犍陀羅語龜茲方言。殘存材料之中，扣除知名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龜茲語通行許可證，可以確定劃歸官文書者稀少，錄文多少含有不確定性，難以進行精密格式分析。安西（大）都護府時期以降之胡語文書則絕大部分是龜茲語寫成的佛寺紀錄⁽³⁾，僅少數內容反映官府互動。如果逐一介紹零星殘件，或者摘錄寺院帳曆字句，容易陷入大量轉寫存疑與釋詞糾葛。因此本文著眼於龜茲官文書的整體發展，嘗試結合史料釐清其源流與趨勢。

提到龜茲胡語文書，讀者大概會想到龜茲語。不過這類資料之現存者多屬隋唐時期。除了法藏通行許可證木簡可以置於 7 世紀上半葉（Pinault 1987; 慶 2013d），它們通常寫在紙上並且無一例外地採用婆羅謎文之西域北道字體。它們在書法和語言特徵方面都與已知最早的龜茲語文獻——也就是克孜爾石窟發現的若干佛教經籍——差異顯著。後者現存寫本的年代上限大致估計為 4、5 世紀之交（參見 Malzahn 2007, Peyrot 2008, Sander 2009。這表示龜茲人最初嘗試使用婆羅謎文字書寫的時間點可能再早一些），不易用來追溯操龜茲語的人群究竟何時立足當地，而龜茲語又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其民間最主要的口說語言（spoken language）。就龜茲語木簡展現的有限詞彙來說⁽⁴⁾，不容置疑的隋唐之前漢語借詞包括計量單位之石（龜茲語 *cāk**）、斗（龜茲語 *tau**）、炬（龜茲語 *cok*，通常表示以油料照明，特別是油燈⁽⁵⁾）。這些詞語像是涉及屯戍，可是目前尚未確認其借用屬於龜茲語演化過程中的哪一個階段。格式用語則多屬唐代以後借入，例如 *şau* 以及 *tep*，分別指“抄”（Ching 2018b）以及“牒”或“帖”（慶 2017a: 140–141）。此外，盡管生肖紀年不用於古代龜茲官文書，但是石窟題記證實龜茲民間至少從 7 世紀上半葉已經習於如此紀年（詳第四節（3））。

在龜茲語發展成書面用語（written language）甚至是龜茲的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以前，該地已有長遠歷史。在漢籍可資追溯範圍內，當地分別在公元前 1 世紀與公元 1 世紀和漢朝、大月氏來往⁽⁶⁾，漢代龜茲境內設譯長四人。這些譯長可能不只充當口譯，還負責繕製外交文書（詳下節）。

(2) 此處“文書”用義見慶 2017a: 1–5。馬雍（1990: 60–111）、長澤和俊（1996）等眾多學者均曾考述西域南道行用佉盧文的年代與範式。由於決定性的定年錨點有待專家最後拍板定論，在此僅約略將尼雅、樓蘭出土者繫於 3–4 世紀。

(3) 重要例外是俄藏烽子名籍以及老人名籍（Pinault 1998; 慶 2017a: 386–389）、疑似寫於唐代的法藏紙質通行許可證（荻原 2013）以及一件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文書（慶 2017b），不過這幾件文書依然稱不上完整，連主事者名字與確切年代都不清楚。

(4) 除了上述通行證木簡之外，多數龜茲語木簡文書可以粗估為 6–7 世紀。明顯例外是克孜爾谷西區清理出來的一批寫在木簡上的唐代畜產品消費記錄，拙錄見新疆龜茲研究院等 2013a，修訂版發表於趙莉、榮新江編《龜茲石窟題記》，待刊。

(5) Lubotsky and Starostin 2003: 263。

(6) 彼時之大月氏亦即西方史家習於指稱的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政權中心在今烏茲別克南部、塔吉克斯坦西部、阿富汗北部，大夏語作 *τοχαραστανο*（Sims-Williams 2015），後期寫作 *τοχαραστανο*，以下描述其地理概念時亦稱“吐火羅”或“吐火羅斯坦”。在更多證據出現以前，這項名稱不宜與後來 20 世紀初期德國學者強加冠名的“吐火羅語”混淆。

已知漢唐之間，西域主要流行文字包括希臘文、阿拉米文（廣義包含粟特文）、佉盧文以及婆羅謎文。前兩種文字也發現於龜茲，但為數零星，暫且不論⁽⁷⁾；婆羅謎文在當地主要用來書寫梵語以及龜茲語，內容多屬佛教經籍；佉盧文更常見於木簡文書⁽⁸⁾。在目前筆者能夠掌握的範圍內，龜茲境內出土的佉盧文書全屬犍陀羅語龜茲方言，梵語化程度不一。它們保存狀態甚差，不易徹底破譯，可是考慮到出土地點的年代上限，不太可能將個別殘簡的書寫年代提到 3 世紀以前。其字體較為特異，尤其是字符收筆往往特意頓挫或帶鉤，導致附帶元音 *o* 和 *u* 的寫法通常難以鑑別，茲依施密特（Schmidt 2001）命名為“龜茲佉盧文”。儘管這類簡牘的語言特質和筆畫字形與尼雅文書最相近，然而兩地文書呈現的犍陀羅語內容在套語、辭彙、語法方面仍有難以完全化約的差異，特別是龜茲佉盧文書的梵語化傾向往往更強烈。

1994 年，哈瑪塔（J. Harmatta）就古代新疆行用佉盧文提出假說：他一方面認同塔里木盆地從未臣屬貴霜之一派學者看法，故而假設一批貴霜官僚在 234 年貴霜西部被薩珊吞併後逃往鄯善，為建立該國行政和書面用語扮演了重要角色。該氏主張從文字特徵起見，尼雅佉盧文乃是傳自吐火羅斯坦而非犍陀羅（Harmatta 1994: 435–436；類似看法參見馬 1990: 85–86）。與此同時，他推測佛教之大眾部僧團將犍陀羅語和佉盧文帶到于闐等城郭，此外還有若干傳教者沿喀喇崑崙路線將各種犍陀羅語變體帶到了塔里木盆地，時為公元 1 世紀中葉以前（Harmatta 1994: 491）。這彷彿是說在所謂“貴霜官僚”逃到鄯善以前，犍陀羅語和佉盧文在新疆僅限佛教徒內部使用。這樣的看法忽略了佉盧文作為宗教文字以外的功能——至少就錢幣銘文而言，它也具有政治和經濟意義，從而佉盧文使用範疇未必限於佛教徒。

從遺址性質考量，尼雅、樓蘭早已沙漠化而得以埋藏眾多遺跡，相對濕潤的龜茲地區則不斷革新、開發，很難期待留存多少年代久遠的遺物，從而易於判斷兩地佉盧文書寫文化產生的時間差距如何。不過所謂“龜茲佉盧文”的傳統看來並不短暫。筆者在嘗試破譯柏林科學院藏克孜爾石窟出土龜茲佉盧文木簡 TS42 時發現 *divi* 一詞，擬釋其意為“文書”並視為伊朗語借詞⁽⁹⁾。一旦注意到這個詞語的存在，它在其他龜茲佉盧木簡的例證隨即浮現，似泛指龜茲王諭令、商業文書與行政判決。由於理論上大夏語 *𐭣𐭥𐭫𐭲* 的早期形式是 **dipi-*（BD II: 227），故而龜茲佉盧文書反映的 *divi* 一詞既可能溯源自貴霜政權盛期，亦有可能更早。不過，這個問題蘊含了語言學、歷史文獻學兩方面難題：首先，近年伊朗學者陸續對中期伊朗語分化過程中 *t*、*d*、*θ*、*δ*、*l* 等音位變化以及相應的文字代表音值的通行理論有所反省質疑，從而易於推定 *divi* 之借用應當連繫到古代伊朗語、中期伊朗語抑或其過渡分化階段⁽¹⁰⁾。再結合龜茲語、焉耆語（吐火羅 A 語）的聲韻特質來看，有時很難甄別若干伊朗

(7) 希臘文而以大夏語書寫者例如碎片 Pelliot Koutchéen No.bleu 9，參見 Pinault 2007: 188；庫車出土粟特文碎片與題記及其書目回顧參見影山 2005: 363, n. 4，其時代按照吉田豐教授的意見應置於唐代以後。以粟特文書寫的粟特語佛經殘片還有克孜爾石窟出土的 So 17100 (recto = Nr. 801 in Reck 2016)。值得注意的是，芮柯（Reck 2017: 136–139）指出疑似來自克孜爾或吐峪溝而無法辨識語言的德藏粟特文殘片，書法比較特異。

(8) 邵瑞祺（Salomon 1998）分析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庫車發現佉盧文佛經貝葉殘片，無論是字體與語言特徵均屬於中亞佉盧寫本的典型期或晚期，極可能為境外輸入龜茲者，但是這類發現甚為稀少。

(9) 古代波斯語 *dipī* ‘writing, inscription’、大夏語 *𐭣𐭥𐭫𐭲* ‘document, copy, text’；參見慶 2014: 69。有關印度—伊朗語形式亦參見 Sims-Williams 2002: 227。

(10) Sims-Williams, p.c. 21/03/2018。亦參見 Sims-Williams 2016a, Lurje and Yakubovich 2017。

借詞究竟是更可能來自大夏語或粟特語 (Peyrot 2015)。兼之最近有歷史學者認為吐火羅斯坦與印度的商人直到 3 世紀還控制著前往中國的商隊貿易並深刻影響塔里木盆地語言，而他們也是粟特人經商的導師 (de la Vaissière 2005: 497)。而此前馬雍 (1990: 74, 85) 則猜想西域南道安德悅 (Endere) 出土的，使用于闐王年款而字體、語言習慣均與樓蘭、尼雅出土品明顯有別的 KI No. 661 佉盧文契約，其印度俗語乃粟特人使用者，于闐民間不通行佉盧文。盡管後兩項看法並不完全彼此互斥，卻令人不得不考慮犍陀羅語和佉盧文最初傳播龜茲時，其外交、商業和宗教功能比重如何，而隸屬貴霜的粟特先民又是否曾經在推廣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從而增加了這項課題的複雜性。

TS42 性質為龜茲王對耶婆瑟雞 (略當今克孜爾石窟，詳第四節(1)) 比丘僧團下達的諭令，令文以 *milima* 計量穀物 (犍陀羅語尼雅方言 *milima*、大夏語 *μῖδο*，源自希臘語 *μέδιμνος*)，甚具貴霜文化特色。龜茲語方面，同樣不易論定借用時段屬於貴霜帝國強盛期抑或該時期前後的伊朗語借詞包括 *kṣum** “治年、統治期間” (大夏語 *χρovo*，也用於犍陀羅語龜茲方言等多種西域語言)、*ārte* “水道、堤岸(?)”、*newiya* “水渠”、*spaktām* “課役、勞務”、*pito* “價格”以及下文 (第四節(2)) 予以討論的 *mot* “酒”。另外，龜茲語 *yap* “大麥”也被認為借自印度—伊朗語族 (Pinault 2008: 371)。在龜茲語的古代期階段及其先行階段更加明朗化以前，暫時只能含糊假定操龜茲語人群的祖先從伊朗文化圈習得若干行政概念、商業習慣與技術產業。不論如何，TS42 提到龜茲王在某年供應 1000 *milima* 穀物給耶婆瑟雞諸僧伽藍，其單位與尼雅、樓蘭佉盧文書共通。因而這項特徵提示我們考慮下述可能性，即 3、4 世紀南道通行佉盧文之際，北道也發展出平行的佉盧文書寫傳統。

龜茲地區木簡文書的簡易外觀暗示了這項傳統的悠久⁽¹¹⁾。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是：一、簡面多呈方形，簡面平整，不帶槽、函、柄等結構；二、通信用的木簡四緣通常有 v 形缺刻以固定繫繩，尺寸較小者僅上下緣缺刻；三、不少簡面中央留白以備緘印。這種形制目前僅見於龜茲⁽¹²⁾。由於簡面尺寸不一，不妨推測其緘封、繫繩也有繁易之分，但原則上其加工比樓蘭、尼雅、于闐等地發現的漢、胡木簡省事。上述龜茲王詔諭 TS42 亦採用此形制。與其認定龜茲古代文書格式粗鄙，不如考慮其流通率與需求量頗為可觀，從而工匠、書手為了提高製作以及重複利用的效率，設法減省了外形細節。

佉盧文在龜茲行用之持久，乃有關研究之一大難題。盡管筆者 (Ching 2013b) 將其年代下限從過去學者習慣指稱的 7 世紀謹慎微調至 6 世紀中期或下半葉，龜茲仍然是世界上已知佉盧文最晚停止使用的地區。特別是最初獲得施密特 (Schmidt 2001) 破解的三枚雙語一雙文字木簡，該氏證明兩面內容高度相關，屬於同一事項的並行紀錄⁽¹³⁾。然而其龜茲語不甚具有古代期特徵，其婆羅謎字體也不算古老。這意味著佉盧文、婆羅謎文曾經並用於龜茲稅政體系，惟其年代上下限頗難釐訂。此外，《劉平國碑》反映的漢文行用也值得深入思考。下文即嘗試從漢籍出發以討論有關歷史課題。

(11) 這些出土品理論上不妨參照漢簡功能與用途來分成檢、牘、檄、簿等類別 (對於尼雅樓蘭木簡的最新嘗試參見關 2016)。不過龜茲出土木簡絕大多數遠遠稱不上完整，茲仍泛稱之。

(12) 例外是和田博物館近年收藏的一件木簡。根據王臣邑和段晴解讀 (Loukota 2016，並參見段晴 2016)，該件木簡似乎涉及逃匿鄯善的龜茲人。可惜木簡關鍵文字比較模糊，筆者擬另文細證。

(13) 該氏以為三件均為葡萄酒買賣契約，筆者 (Ching 2010) 則分析為稅收憑證，只有一件確實與酒有關。具言之，稅物在地方徵集時先以婆羅謎文龜茲語寫下款項；其後較高層官員收納時，以佉盧文犍陀羅語重寫並具載收訖年月日，發回地方。亦即龜茲中央行政機關似乎比地方上更堅持使用佉盧文，詳見 Ching 2013b。

2. 西漢時期的龜茲

龜茲王家登上歷史舞臺之初，即安然受杆彌送太子賴丹爲質，甚至在賴丹獲漢朝晉封後也肆行誅戮。這在《漢書·西域傳》渠犂一節有所描述⁽¹⁴⁾：

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

“印綬”之“印”正是製作文書的重要工具。李廣利送賴丹，一說發生於太初四年（前 101）春（余 2005: 188），想來在他的判斷裡，與其讓未來杆彌王納入龜茲麾下，不如爲帝室所用；而在龜茲君臣眼中，此人既成爲近鄰首先獲得漢朝賜印的貴族，如果容忍其屯墾，則杆彌勢力將從龜茲西南延伸到東畔，確實堪慮。雖不明當時龜茲是否自有印章體系⁽¹⁵⁾，但既然上書謝漢，王族無疑知曉文書具有外交功能，境內亦已有書寫人才。昭帝元鳳年間（前 80—前 75），傅介子出使大宛，來往均經龜茲，並於回程時責問龜茲王斬漢使事。顧及此前除了賴丹被殺，更無類似記載，傅介子追究者應即此案（余 2005: 188—189）。《漢書·傅介子傳》云⁽¹⁶⁾：

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

傅介子來回經過的道路要是也途經烏孫，則路程可能大致如松田壽男（1970: 95, 265）所論，即沿庫車河經蘇巴什遺址上溯河谷至和靜縣，略當今日獨庫公路。這條道路甚難維修，却是穿越天山之重要孔道。龜茲王親自謝罪，還洩漏匈奴動靜以贖前愆，傅介子却反而研議行刺，其處心積慮足以看出龜茲之不凡，可是霍光更屬於操縱樓蘭⁽¹⁷⁾。

(14) 《漢書》卷九六下，3916 頁，參見余 2003: 495。不易理解李廣利何以過杆彌。余太山（2005: 188; 2012: 124—126）先生權衡白鳥庫吉、藤田豐八歧見，推測其凱旋大軍走南道，偏軍走北道，可備一說。然而，倘若長澤和俊（1983: 63—65）訂杆彌爲丹丹烏里克可信（亦見余 2005: 92—94），這似乎意味著李廣利寧可避開匈奴劫掠風險，從龜茲西南下行再東轉南道。那麼他便有可能在回程時於龜茲城或者龜茲—杆彌之間碰上賴丹。

(15) 已知龜茲、尼雅佉盧文書中所謂“印章”與印度語相同，即 *mudra/mutra*（大夏語 *μολρο*）。該印度語詞的終極來源可能爲古代伊朗語（BD II: 235）。

(16) 《漢書》卷七〇，3001—3002 頁。

(17) 結果元鳳四年（前 77），傅介子成功斬樓蘭王並擁立質子尉屠耆，漢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宮女爲夫人，從長安還國並田伊循以撫之。余太山（2005: 87）以爲霍光不同意行刺龜茲王是因爲樓蘭更加重要，固

宣帝主政初期之本始二年（前 72），校尉常惠成功與烏孫合力削弱匈奴，但宣帝仍然不擬向龜茲興師問罪。案昭、宣二帝寧可懷柔，大概不只是因為龜茲倚仗烏孫、匈奴，有恃無恐，也是顧忌其本身實力。《漢書·西域傳》記錄龜茲戶口、兵力遠勝蔥左其餘城郭，故而可以想見常惠不願放過封賞烏孫，借道龜茲之絕妙時機，於是在霍光默許之下，設法迫使龜茲王獻姑翼以換取漢朝冊封王位。《漢書·常惠傳》載⁽¹⁸⁾：

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順利卸責的嗣任龜茲王（名為絳賓）雖然降服，卻未完全服軟，而漢朝也沒有立即領印。不到幾年，此王便強娶解憂公主與烏孫昆莫翁歸靡之長女，使漢朝不得不正視這段懸置問題。《漢書·西域傳》渠犂一節如此說明經過⁽¹⁹⁾：

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前 65），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龜茲王這次上書所用語文仍然不明，但是看來此人英勇果敢，不但偕夫人入朝取得印綬，還儼然以皇帝昆弟自居——這與武帝詔任文（李廣利殿軍）捕樓蘭王入關，簿責其陰結匈奴的場面想必完全不同⁽²⁰⁾。然而，宣帝不但嘉納這名繼匈奴、烏孫之後娶得皇家血脈的外族首領，也允許他作為漢室在西域代言人，從而感化其傾心事漢⁽²¹⁾。絳賓父子雖揚名西域，卻引起諸胡譏刺，可見當時存在著妒羨龜茲地位的地方勢力。神爵（前 61—前 58）年間，龜茲等諸國出兵五萬人陪同西域都護鄭吉迎日逐王，都護、龜茲之聲勢可謂相輔相成。成帝陽朔（前 24—前 21）年間，段會宗在龜茲受烏孫小昆彌

是戰略起見，但我們也不妨換一個角度來看，即霍光老成謀國，倘若一舉剷除龜茲王室，則當時看來並沒有足以扶植的侍子，反而令天山南路城郭諸國失去重心，不如從長計議為是。

(18) 《漢書》卷七〇，3004 頁。就像傅介子出使大宛一樣，常惠出使烏孫時依然借道龜茲，余太山（2005: 162–163, 189–190）擬繫於本始四年（前 70）。

(19) 《漢書》卷九六下，3916–3917 頁。夫人諱弟史，見同卷 3904 頁。

(20) 其事見《漢書》卷九六上，3877 頁。

(21) 最近桑山正進（2017: 82–86）從烏孫立場分析婚嫁布局，此不贅。

及諸城郭王室子弟謁見⁽²²⁾，丞德想必出力甚多。王莽天鳳年間（14–19），李崇號令莎車、龜茲進攻焉耆，雖然出師不利，猶能還保龜茲。可知直到王莽去世以前，都護、龜茲依舊彼此依恃。

循《漢書·地理志》，西漢在上郡不只設立匈歸都尉以治理歸附匈奴，還特置龜茲縣以安頓降附之龜茲人。該縣設鹽官，或許縣民有擅於煉鹽者⁽²³⁾。這段時期的龜茲史上知名人物為賴丹、姑翼、絳賓和丞德，均難以利用龜茲語知識分析。其中丞德像是漢名；絳賓則似有賓服之意，很難說是否純為漢名或含有音譯（參見慶 2013a: 417）。值得矚目的是龜茲經烏孫往大宛道路長期暢通。段會宗任都護時期，有意率萬餘人歸附的康居太子保蘇匿不知後來安輯何處，卻可以推知龜茲、康居二地往來。在這個時期，龜茲北通烏孫亦谷以連結康居、大宛，往南接精絕、杆彌，同時是天山南沿中點，地點絕佳。其山區不但有礦冶之利，宣帝朝以降更有漢朝供應繒綵，其富足亦是理所當然。《漢書·西域傳》載龜茲置“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以及“譯長四人”⁽²⁴⁾，而葱左諸城郭僅控扼塔什庫爾干的莎車譯長人數相同，可見當時二地各為西域南北道樞紐。

3. 東漢時期的龜茲

《後漢書·西域傳》缺龜茲、姑墨、溫宿、尉頭專條，疑傳抄時漏失，抑或范曄曾有意發揮，惜未竟其志。從各方面跡象看來，西漢覆亡波及龜茲聲勢。王莽時，姑墨王擅殺溫宿王又併吞其國，洵為警訊⁽²⁵⁾。其後莎車王延父子高舉漢幟，對抗匈奴而坐大。其子康於建武十五年（39）封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另一子賢於十七年（41）繼位時獲賜都護印綬，使龜茲正式失去漢室代言人之地位。朝廷後來奪回印綬，賢卻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為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²⁶⁾。這段文字既說明龜茲等地區面臨匈奴、莎車兩方徵賦之窘迫，亦見證眾城郭彼此行之有年的書面交往。

莎車王賢的軍事擴張進一步令諸國離心，導致龜茲一度傾亡而不得不全面臣服匈奴。《後漢書·西域傳》載⁽²⁷⁾：

（建武）二十一年（45）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二十二年（46），賢知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

(22) 《漢書》卷七〇，3029–3030 頁。

(23) 見本文注(1)，又見《後漢書》卷六五《張奐傳》夾注，1965 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2138 頁；卷八七《西羌傳》夾注，2893 頁。龜茲有化學鹽礦之利，見松田 1970: 399–413；森安 2004。

(24) 《漢書》卷九六下，3911 頁。“千長”制度可能根源於匈奴軍政。

(25) 《漢書》卷九六下，3910 頁。

(26) 《後漢書》卷八八，2923–2924 頁。

(27) 《後漢書》卷八八，2924 頁。

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

鄯善王安上書光武可能使用漢文，而莎車王賢以何種語文號令城郭尚不易定論。後者雄才大略，一度割裂龜茲⁽²⁸⁾：

焉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為焉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駟鞬為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為焉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

焉塞顧名思義是與焉水流域（今烏滸河水系）有某種地緣關係的塞種人，余太山（2005: 296）認為是烏滸流域的塞人王者。莎車如何進攻焉水仍是謎團，可是莎車王賢從龜茲分出烏壘國（或即西漢都護鄭吉所居）而徙駟鞬領之⁽²⁹⁾，還讓自己的孩子君臨龜茲，改變城郭階序結構的意圖十分明顯。未幾，該王又以貢稅減少為由攻擊大宛，並與康居相攻。我們或許可以揣測起因是一旦莎車占領龜茲，原來頻繁與後者通商的大宛便索性滯納不交，抑或是基於某種同盟關係而對莎車實施通商緊縮。此後賢在於闐以及匈奴—龜茲聯軍兩方輪番攻擊下敗陣，最後被女婿于闐王廣德所執，時為明帝永平十六年（73），正是班超出使西域，招降鄯善之時⁽³⁰⁾。當時于闐在史上首次雄張南道，仍受匈奴監護，雖然即時受班超鎮撫，龜茲却馬上攻破疏勒，重新稱霸北道⁽³¹⁾。班超盡管成功替換了疏勒王，不過焉耆、龜茲在匈奴撐腰下攻沒該年復置之西域都護，其後班超布陣十餘年始能收拾全局。班超的謀略顯示龜茲此時並非徒然臣屬匈奴，狐假虎威，而是逐步重建對西邊小國的宗主關係⁽³²⁾：

（永平）十八年（75），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盤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

(28) 《後漢書》卷八八，2924–2925 頁。後世除了歷史上舉行遠征的吐谷渾慕利延，試圖逾越蔥嶺、雪山者還有于闐勃伽夷城流傳的古王伐迦濕彌樓傳說（季 2000: 1015–1016），以及古藏文《于闐國授記》所載 *Kīrti* 王曾隨迦膩色迦以及某龜茲王共征天竺（朱麗雙 2017: 200）。後一事件尤難索考，或許不過是龜茲、于闐二地共同繁衍之傳說。

(29) 駟鞬從上下文來看既可能理解為焉塞貴人，亦可能理解為莎車貴人，待考。

(30) 《後漢書》卷四七，1572–1573 頁。

(31) 《後漢書》卷四七，1574 頁：“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74）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我們或許可以考慮兜題（OC to-die）是否可以連繫到後世龜茲語之 *totte* “極端、邊境”或者王名 *Tottika*，不過字中輔音和尾韻的對應關係還需要仔細檢證。又，本文提供的上古音（OC, Old Chinese）依據郭 2010；中古早期漢語（EMC, Early Middle Chinese）和中古晚期漢語（LMC, Late Middle Chinese）之構擬則參照 Pulleyblank 1991，以便凸顯隋唐前後變化，讀者比較時宜參照二書例言以辨別兩者理論細節差異。

(32) 《後漢書》卷四七，1574–1575 頁。

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龜茲能夠順利西進，無疑是匈奴奧援使然。不過焉耆、龜茲被賦予的角色不盡相同。雖然《後漢書》卷二《明帝本紀》（123 頁）和卷八八《西域傳》（2909, 2928 頁）均云焉耆、龜茲共攻沒都護，但是從下引《班超傳》述永元三年事可以看出，攻沒都護出力最多的恐怕是焉耆、危須、尉犁陣線，與匈奴關係更為直接。在這樣的態勢下，班超正式把戰略目標轉移到龜茲⁽³³⁾：

建初三年（78），超率疏勒、康居、于寔、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臣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寔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嶺可通，蔥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

這段奏疏乍看強調倚靠匈奴者只剩下焉耆、龜茲，令人納罕的是班超強調應該先通蔥嶺。這說明當時龜茲不只仰仗匈奴，和蔥右也有密切往來，控制蔥嶺是拿下龜茲的先決條件。是則龜茲之所以能操縱並非同種的姑墨、溫宿、疏勒王室，便不只是因為獲得匈奴支持，更是因為龜茲王掌握了對西方的外交優勢。這次，班超找到“龜茲侍子白霸”以備取代，可是自從匈奴助龜茲復國以來，期間不大可能質子於漢。如果白霸確實血統尊貴（這也是龜茲白姓首見史籍之處），只能推測此人是班超鎮撫南道時招輯的龜茲貴族。

當班超於建初八年（83）整備完成，莎車早已降服龜茲，亦即當時龜茲至少控有姑墨、溫宿、莎車，基本上打通了前往喀喇崑崙山岳的路徑。對此，班超除了坐鎮疏勒，亦擬招慰烏孫，翌年（84）發疏勒、于闐攻莎車，其具體經過如下⁽³⁴⁾：

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86），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33) 《後漢書》卷四七，1575–1576 頁。

(34) 《後漢書》卷四七，1579–1580 頁。班超斬疏勒王又見《後漢書》卷三《章帝紀》元和三年事，156 頁，並見余 2005: 301。

莎車之策反疏勒，疑似與暗結康居一樣都有龜茲謀劃在內。在該年莎車、于闐、疏勒三國混戰中，連康居、月氏（貴霜）都出面，結果班超告捷，平定疏勒。於是班超挑戰由莎車、尉頭、溫宿、姑墨協力組成的龜茲陣線，龜茲王率一萬騎兵到莎車西界正面迎戰，溫宿王則領八千騎兵牽制于闐⁽³⁵⁾，顯見其時龜茲騎兵縱橫塔里木河中上游之盛況。雖然班超奇計攻下莎車，龜茲依然保有實力。雙方對峙二三年，貴霜再度出兵，動機根據《班超傳》乃是挾怨報復⁽³⁶⁾：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90），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按：應指疏勒東界）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91），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

貴霜一旦畏服，龜茲旋即風靡，可見當時貴霜立場的重要性。仔細推敲，如果七萬大軍數字近於真實，則往東翻越蔥嶺本來艱難，貴霜將領或許早已有意減輕輜重，直接帶金銀去龜茲買糧。然而從貴霜副王出資購糧或者重利賄賂而非發令調遣來看，雙方並非上下級而是商賈夥伴關係。雖然如此，只要貴霜立場改變，比如限制貿易而更多地借由南道與漢朝交往，便會對龜茲造成顯著影響。這在此前匈奴擁立的龜茲貴人名為“身毒”亦可看出端倪。身毒略當天竺（Lévi 1913: 377），其人似與印度—貴霜文化圈有地緣或親緣關係⁽³⁷⁾。倘若當時龜茲境內同時流行漢文化和印度—貴霜文化，那麼匈奴選擇其派系以取代原來傾漢或傾烏孫之王族亦在情理。佉盧文傳到龜茲的上限或許便可溯及此時——無論其文書行政是否已經開端，至少與西方交往時會接觸各種西域文字。

白霸幾乎只是傀儡。延平元年（106），梁懂遊說段禧、趙博占領王城，導致吏人率溫宿、姑墨反叛，翌年罷都護。《梁懂傳》述其事云⁽³⁸⁾：

(35) 《後漢書》卷四七，1580 頁：“明年（87），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溫宿王可能沿和闐河南下，與龜茲行軍有所交叉。

(36) 《後漢書》卷四七，1580–1581 頁。我們或許可以考慮貴霜君主其實是在匈奴、龜茲默許甚至暗示下入侵，以圖打破與班超對峙之僵局。貴霜助漢擊車師年代一說為建初元年（76），見余 2015: 63–64；副王謝及其君主不在本文論考範圍，參見榎 1992；余 2015: 59–62；Falk 2015 (esp. 100)；桑山 2017: 112–123。

(37) 余 2005: 296。具言之，余氏（2015: 47–49）認為《後漢書》之身毒主要指印度河流域。又參見桑山 2017: 127, n. 72。

(38) 《後漢書》卷四七，1591–1592 頁。

謹有勇氣，……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謹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謹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謹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謹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謹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107)，遂罷都護……。

它乾城 (OC t'a-kan/g'ian, EMC t'a-gian) 音聲與雙語文木簡稅收憑證 THT4062 之龜茲語地名表現 *y-tākkaiṃ* (*y-* 爲表示場所之龜茲語前綴，語尾鼻音疑表示間接格尾，犍陀羅語部份作 *i[t]ākkai*) 略近，詞幹可能爲 *Takko**，待考。後者可聯繫到唐代伊馱城 (Ching 2013b: 67–68)，又音似唐代多褐城 (EMC ta-γat, LMC ta-xfiat，特別是倘使尾音 *t* 用以標示元音之短促)。然而，即便這些詞語含有同一詞幹，也不必然指向同一地點。這個難以完全用龜茲語解釋的成分或許意味著某種地貌或設施，而衍爲常見地名。

延光二年 (123) 夏，安帝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屯柳中。翌年班勇撫鄯善，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³⁹⁾。白霸、白英關係不明，此後直到《晉書》載龜茲王白山爲止，長達一百六十餘年白姓王未見史傳 (參見下注(54))。惟不論龜茲王室變革與否，後來的統治者與中原王朝打交道時，均不妨以“白”爲漢姓以示對於班超父子功績以及漢家恩威之推崇。最近，筆者處理法國探險隊拍攝克孜爾 222 窟主室右側壁影像時，注意到題刻 Kz-222-ZS-R-02 之釋錄還可以稍加改進如下⁽⁴⁰⁾：

¹⁾ *6 kṣuntsa tricce [C]occene śtarcyē ṇune Taitsyā(m)kunem Molmiśi* ²⁾ *naṣweṃtsa maiweñ pā kāñ ce[m]*
e[ṣ]i – [rṣāñā] ykene simtsa maitare tuntse [ṣo]tr[i] paṃykarē |

6 年，處於 *Co** 的三月，四月九日，以大將軍 *Molmiśi* 爲首的，冠有 **pāk* 的一群青年來到這 *E[ṣ]i-?* 的地界，他們寫了這條記錄。

其中 *pā kāñ ce[m]* 或許可以理解爲 *pākāñc* 與隨後的指示形容詞 *cem* 聯寫時省去一個 *c*。類似例證是 225 窟將 *śak kṣutsa* “十年”寫爲 *śakṣutsa*，正式錄文待刊。是則新出詞語 *pākāñc* 可視爲形容詞複數主格，其主格單數形式大概是 *pākā** “帶有 **pāk* 的” (providing with **pāk*)。這像是把唐人所謂“白姓”的概念導入龜茲語而形成的特殊表現，而題記意在記述 *Molmiśi* 與一群白姓青年貴族到克孜爾附近某地區巡視。換句話說，這很可能是龜茲語資料中關於“白姓”說法之首例，而直到 692 年王孝傑收復四鎮以前，本地人可能缺乏對於所謂“白姓”的固定說法。

(39) 《後漢書》卷四七，1589 頁。

(40) 皮諾 (Pinault 1987) 舊編 G-Qm 12，探險隊照片參見該書 Plate XCI。編號、2011 年現場照片與此前修訂參見新疆龜茲研究院等 2013a: 357–358 & 圖 4。 *Molmiśi* 疑即白莫苾 (慶 2013a: 414, n. 1)。其月份齟齬疑可繫於武周聖曆年間 (698–700)，從而 *Co** 疑即“周”。又，第二列 <yke> 字符下半部與刻劃粗細相近的漢字“督”交錯，詳見筆者在趙莉、榮新江編《龜茲石窟題記》之考論，待刊。

焦點移回公元2世紀初。安帝元初（114–120）年間，疏勒王放逐王舅臣磐至大月氏。臣磐回國後，促使貴霜支持其姪子為疏勒王，由此疏勒浸強，役使莎車，與龜茲、于闐抗衡⁽⁴¹⁾。順帝陽嘉三年（135），涼州刺史、戊己司馬、西域長史合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共三萬餘人伐疏勒未果，可知彼時龜茲猶效力於漢室。可是之後情勢有變⁽⁴²⁾：

永壽元年（155），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吳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吳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按：指上郡龜茲縣），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吳和親，共擊莫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

至遲在桓帝永壽二年以前，疏勒、龜茲已與《後漢書》所謂“羌虜”攻抄河西以及并州雲中縣（今呼和浩特一帶）。該書《李膺傳》云⁽⁴³⁾：

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

換句話說，有可能在張吳以龜茲縣作為反攻據點之前，部分縣民已經加入南匈奴與東羌作亂，因而《李膺傳》所謂龜茲、疏勒大概主要是指當地雜胡。不過，漢代羌人、龜茲人的接觸也並不限於河西隴右。該書《西羌傳》云⁽⁴⁴⁾：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107）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傲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

結合《梁懂傳》，安帝派遣的降羌大軍正是要前往穩定龜茲王城。然而諸羌叛逃，剛剛召還的都護段禧安撫無效，遂致西域又絕⁽⁴⁵⁾：

(41) 《後漢書》卷八八，2927頁。永建二年（127），順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其後於133年、168年朝貢。承注（36），不少史家注目於照拂臣磐的月氏王是否即迦貳色迦一世（季2000: 138–142; Falk 2015: 110–111），最近余太山（2015: 2, 62–64）主張為閭膏珍。對此，筆者以為既然班勇於127年獲罪免官，此後漢廷對西域情報掌握有限，僅憑中國史料難以確認或否認近年Falk主張的的迦貳色迦一世年代論，亦即設定貴霜元年為公元127年，從而相關問題有待最新考古、錢幣與文獻學證據加以檢證。

(42) 《後漢書》卷六五，2138頁。

(43) 《後漢書》卷六七，2191–2192頁。

(44) 《後漢書》卷八七，2886頁。

(45) 《後漢書》卷八七，2886–2887頁。任尚即西域都護段禧之前任。

明年春（108）……校尉侯霸坐眾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為校尉。其冬，（鄧）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隴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

漢軍一旦棄守，很難說龜茲縣民寧可流離他縣或返回故土。截至安帝元初六年（119），“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⁴⁶⁾。永寧元年（120）春，上郡沈氏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延光元年（122），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遭度遼將軍耿种率諸郡及烏桓擊破，隨即班勇出任長史，西域得以復通。順帝永建元年（126），校尉馬賢平定涼州羌人與雜種胡；四年（129），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於是復朔方、西河、上郡三郡，督促徙者各歸舊縣。永和元年（136）情勢再度惡化⁽⁴⁷⁾。《西羌傳》在公元 148–155 年間乏於記事，不確定《李膺傳》所云諸羌、疏勒、龜茲之亂是否發生在這段空白期。不管如何，永和以降漢廷對西域控制微弱（參見余（編）1995: 70–71），卻也是羌、胡活躍交融時期，而後一現象或許涉及永壽四年（158）《劉平國碑》的歷史背景。

從碑文所見人名“夏羌”、“程阿羌”以及趙、石、狄等姓氏來看，不排除碑文列舉“秦人”含有河隴雜種羌胡，只是已經相當漢化了而如此自稱，抑或一律被作者淳于伯隗如此歸納。劉平國出身不詳⁽⁴⁸⁾，但此人無疑親近漢文化。不論這一行人是否含有永初元年乃至建康元年（144）逃逸出塞的羌胡與漢軍，或者更多地招募了班超父子留在西域的子弟兵，他們都可能感服於王褒、李膺等將領重振之漢朝聲威，從而謹遵漢曆。雖然龜茲遠在西陲，未及改換年號，但干支紀日與朔望計算合乎漢制，可知雙方至少在曆法方面密切接軌。揣摩文意，劉平國一行在 158 年不但把亭障修到當地，稍早還整建烏累等要衝，有如大型邊防建設計畫之一環⁽⁴⁹⁾，從而很可能如黃文弼 1928 年 11 月 26 日日記（黃 1990: 339）判斷“總之此關為龜茲國所建，屬龜茲，不屬（莎車王割出之）烏壘，決無疑義”（引文中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據日記前後文補充）。是則其碑刻之所以選用漢文，或許是為了喝阻畏怖

(46) 《後漢書》卷八七，2891 頁。以下大事均摘自同卷，茲不一一出注。

(47) 《西羌傳》謂“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案：永嘉元年，即公元 145 年），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見 2897 頁。

(48) 龜茲有左將軍，見注(35)，並參見馬 1990: 34–35；朱玉麒 2017: 345。

(49) 可能正如馬雍（1990: 39）推測，這八人只是探勘從“口谷”到當地路線並打樁，無暇修築。若循該氏意見，認為“口谷”指今日鹽水溝，則清末從碑石附近明布拉克到庫車、拜城道路三叉口約 13 砲台（渡邊 1937: 313），以一驛 15 里行程計，距離確實大致相當。另一值得考慮的位置是今日天山神秘大峽谷景區至庫車煤礦區一帶，附近有唐代阿格故城等戍守、礦冶遺址。是則龜茲北界大致朝東西走向，經哈拉柯爾而延伸至黑英鄉境，約當黃文弼 1928 年在庫車北方山中之考察路線。其路線見黃 1958: 圖六。惟唐代柘厥關應另當別論，參見慶 2011。

於漢朝聲威的遊牧民族。其防範對象既可能是元嘉元年（151）從蒲類海西遁之北匈奴，亦可能是北匈奴衰微後盤據天山者，鐫刻處則有可能是當時龜茲特意標定之北界。

4.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龜茲

承上節，公元 2 世紀中期（桓帝時期）以降似為龜茲史重要轉折。然而此後中原關於西域的官方記錄較少，學者僅能根據裴松之注《三國志》引《魏略·西戎傳》推斷龜茲再度掌控姑墨、溫宿、尉頭、鄯善、焉耆、疏勒、于闐也吞併鄰邑，各據一方⁽⁵⁰⁾。由於接下來的時期是歐亞史研究熱點⁽⁵¹⁾，因而龜茲書寫傳統之發展也應當置於大環境來考慮。已知《晉書》中，龜茲的印度—伊朗風尚已然濃厚⁽⁵²⁾：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

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眾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焉耆一條則記載⁽⁵³⁾：

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獯胡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立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⁵⁴⁾，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蔥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於外，為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眾疆理西域，……熙率羣下四萬人肉袒降於宣。呂光討西域，復降於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這也是焉耆龍姓首見漢籍之處。龍熙應為漢名，泥流（EMC neĭ-luw，見《呂光載記》）則與德藏龜茲語契約木簡 THT4001 所見龜茲王子 *Niyire** 有共同成分⁽⁵⁵⁾。該件木簡的書法和語言稍具古老特

(50) 參見《三國志》卷三〇，1959 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859–860 頁。該書卷二（79 頁）載黃初三年（222）二月鄯善、龜茲、于闐各遣使奉獻，其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又參見卷二四《崔林傳》，679 頁；余 2005: 339。

(51) 重要焦點包括 3 至 4 世紀西方人所謂“Huns”的族群遷徙以及佛教僧人在中國與西域間的頻繁往來等。2017 年 8 月 29–31 日大英博物館、布達佩斯大學召開“Hunnish Peoples in Central and South Asia: Sources of their Origin and History”討論會，會議成果匯總在即，本節只提供與龜茲書寫文化最為相關之淺見，並結合外國探險隊所獲資料之最新分析成果。

(52) 《晉書》卷九七，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2543 頁。

(53) 《晉書》卷九七，2542–2543 頁。太康六年（285）龜茲、焉耆遣子入侍（卷三，76 頁），《晉書·四夷傳》應含有該年情報，此外或許會用到已佚文獻，例如段業《龜茲宮賦》。同年武帝遣使大宛（2544 頁），未知二國遣子入侍與西使大宛關係如何。又，前涼攻伐鄯善、焉耆、龜茲紀錄分歧，然而基本不影響本文主旨，有關研究回顧參見伊藤 2017a、伊藤 2017b。

(54) 白山亦可解釋為以地理名詞為名，該詞見白鳥 1970a: 14–15。與白純（亦作帛純）關係不明。

(55) 木簡釋文參見 Ching and Ogihara 2012。泥流、龍熙是否為同一人，學界有不同看法，參見松田 1970: 277；榮 1995: 145；余 2005: 375。焉耆投降似可據《十六國春秋》繫為 383 年（余 2005: 375）。

徵，却不屬於已知龜茲語文字資料最古老的階段，不大可能置諸 4 世紀。因此如果泥流、*Niyire** 可堪比較，這意味著中古時期的焉耆、龜茲王族在 *-arjuna* 之外還共享若干命名成分。奇特的是復仇者羅雲倘若不是音譯⁽⁵⁶⁾，則這個時期羅姓胡人若非絕無僅有也極罕見。已知中古時期羅姓往往代表吐火羅地區出身者⁽⁵⁷⁾，則龜茲要是在晉代即居住羅姓人氏，較合理的看法大概是貴霜被薩珊吞併後，當地移入了若干貴霜難民，待考。

龍會占龜茲，却未屠滅，至少呂光壓境時龜茲仍然富有。案《晉書》稱焉耆“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故而龍安受辱或許只涉及城郭貴族子弟的交游紛爭或宮廷鬪牆，未必涉及二國大軍之長年對峙。381 或 382 年，車師前部王、鄯善王游說苻堅攻焉耆、龜茲並置都護，各願舉國擔任前鋒⁽⁵⁸⁾。當時，龜茲除了信仰佛教，似乎還流行龍神信仰⁽⁵⁹⁾：

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脈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

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獫狁。獫狁弟訥龍、侯將廼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鎖，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羈，策馬擲人，多有中者。眾甚憚之。……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鎖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呂光遭遇的“黑龍”或即沙暴或雷雨，卻不妨由此推測彼時所謂白姓或龍姓可能僅僅是龜茲、焉耆王室因應漢晉習慣而選擇的吉祥象徵⁽⁶⁰⁾。至於臨時支援龜茲的“獫狁”似距龜茲不遠。鑒於呂光從南、西二方進攻王城，“獫狁”可能是位於龜茲北面或東北的新興武裝聯盟，不排除與 5 世紀中期興起的悅般有關，並含有滯留天山之匈奴、烏孫餘裔。倘若《呂光載記》基本可信⁽⁶¹⁾，則獫狁、龜茲原本不甚親密，否則用不著傾國財寶求援。再者，《晉書》載“其城三重”，倘若彼時龜茲只需向游牧勢力繳納貢賦以換取軍事保護，似乎不必如此大興土木。由此不妨猜想晉代龜茲擁兵自重，而這勢必提高了文書行政管理的需求。

(56) 例如法顯譯羅睺羅（梵語 *Rāhula*）為羅云（Deeg 2005: 142; 章 2008: 47）。

(57) 池田 1965: 61; 吉田 1998: 37–38; 吉田 2011: 52。唐代龜茲之羅姓胡人見 Ching 2013c: 337–338。

(58) 《晉書》卷一一四，2911, 2914–2915 頁。年份問題參見余 1996: 83, n. 5。

(59) 《晉書》卷一二二，3054–3055 頁。龜茲圍城似可據《資治通鑑》繫為 384 年（余 2005: 377）。

(60) 參見慶 2013a: 416–417。松田（1970: 277）援引藤田豐八假說，考慮“龍”或“龍熙”音寫焉耆語 *Ārsi* “焉耆”，看來頗為牽強。

(61) 《呂光載記》述獫狁兵力達二十餘萬騎，合諸城郭援兵共七十餘萬，不無可疑。不少學者既已討論有關正史和佛教資料之信實性，對此，筆者基本同意伯希和（Pelliot 2002）針砭，即鳩摩羅什生年可能比現存傳記所載更晚。又，不少中國大陸學者遵循周一良看法，擬獫狁為羯胡之一種（參見余 2005: 371），可備一說。

（1）龜茲的“佛國”化

佛教最初何時生根龜茲仍不易確知⁽⁶²⁾，但理論上從落腳到舉國崇拜並非一蹴可即。早期學者往往認為其佛教藝術是貴霜—犍陀羅政權主宰的明證⁽⁶³⁾。可是佛教並非所向披靡，絲路至少還流播祇教以及方興未艾的摩尼教，是以佛教在龜茲的壓倒性勝利是有待解釋的。對此，筆者考慮當地統治階層可能趁貴霜受薩珊壓迫之機，企圖在蔥左諸城郭之間南面稱雄，而其套用的王者典範可能是佛教徒塑造的迦膩色迦王。此處所謂“王者”指涉佛教君主觀：偉大王者乃是應運或轉世而生，負有護教之道德義務。這類理念屢屢反映於玄奘採集傳說，例如犍陀羅地區相傳釋迦牟尼在王城外卑波羅樹下南面說法⁽⁶⁴⁾：

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王命世，號迦膩色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瞻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後略迦膩色迦王皈依故事）

釋迦牟尼有生之年未去犍陀羅，當地却產生如此傳說。類似理念也一度盛行呬摩咀羅⁽⁶⁵⁾：

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觀貨邏國呬摩咀羅王唐言雪山下，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

此王仍待考證，至少傳說表明其王族曾號稱釋迦族後代，還復興了迦膩色迦王的歷史光榮。7世紀烏仗那、梵衍那、商彌王族也各自號稱釋種餘嗣；于闐多種傳說並行，不僅王室奉阿育王為先祖，亦有毗沙門天祚胤、古代迦濕彌樓王轉世等多種傳說⁽⁶⁶⁾。可見貴霜王室衰頹後，自詡奉天承運的地方首領大概不在少數。

在這場佛教化世界的話語權競賽中，地處邊陲的龜茲看來野心勃勃。筆者（慶 2017a: 6–7）曾借僧祐《出三藏記集》（下稱《記集》）卷一所收《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提出其王室疑似仿效貴霜納質，不但設置與溫宿、姑墨王淵源深厚的僧寺，還將鄰國王侯婦女安置尼寺並嚴格規範其行動⁽⁶⁷⁾。

(62) 自烈維（Lévi 1913）詳論龜茲史料以來，包括季羨林（2010）、中谷英明（1998）在內的不少學者均曾嘗試探討佛教在龜茲之初傳。不過這項議題不但關聯到印度—中亞佛教的整體脈動，近年學者對於中亞及新疆出土佛典文獻之繫年與部派分析之理論前提亦多有省思，龜茲本地之考古學資料也尚在整理，故而有關問題超越了本文趣旨，茲不廣論。

(63) 承注(62)，20世紀初年以來的藝術史學者屢屢指出龜茲王族供養石窟，並藉壁畫形象展現與中亞—印度文化的親緣性。然而學界的壁畫風格分類、分期觀點仍有諸多分歧，在此不擬作為主要研討對象。

(64) 原文見季 2000: 237–239。歷史上的迦膩色迦王是否如此大興佛教仍有待探索，最新討論參見 Jogeward et al. 2012 (esp. 81–84)、Fussman 2015。在後者眼中（Fussman 2015: 159），玄奘採集傳說中所謂“迦膩色迦王”也許不過是泛指貴霜時期君主而已。

(65) 季 2000: 338–339。呬摩咀羅國多考訂為吐火羅斯坦東部，見榎 1951: 133–139；桑山 1990: 400–402。

(66) 原文見季 2000: 517, 1006–1035。

(67) 另一種解釋是溫宿、姑墨境內各有王寺，而兩地當時已正式納入龜茲領土。Hans Bakker 教授指出，留置鄰國王公貴族婦女於寺院以資人質之行為罕見於印度（2018年3月13日講評）。是則龜茲這種做法可能具有創

有鑒於東漢臣磐一派之興，貴霜勢力確實一度擴張到塔里木盆地（余 2015: 2），那麼在此背景之下，假使歷史上龜茲確實曾經與貴霜有所聯姻送質，此時便更容易落實其自詡貴霜接班人之政略。該序云⁽⁶⁸⁾：

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第十 出戒本前 晉孝武帝世出

拘夷國寺甚多，修飾至麗。王宮彫鏤，立佛形像，與寺無異。有寺名達慕藍，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隸藍，五（或六）十僧。劍幕王新藍，六（或五）十僧。溫宿王藍七十僧。

右四寺，佛圖舌彌所統。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座，或易藍者。未滿五臘，一宿不得無依止。王新僧伽藍，九十僧。有年少沙門字鳩摩羅，才大高明，大乘學。與舌彌是師徒，而舌彌阿含學者也。

阿麗藍，百八十比丘尼。輸若干藍，五十比丘尼。阿麗跋藍，三十尼道。

右三寺比丘尼，統依舌彌受法戒。比丘尼，外國法不得獨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嶺以東王侯婦女，為道遠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檢制。亦三月一易房或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戒，亦無師一宿者輒彈之。今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者也。

此序作者極似道安（312–385）⁽⁶⁹⁾，內容則大概參考僧純、曇充見聞。筆者（Ching 2010）曾在烈維（Lévi 1913: 338–340）討論基礎上將達慕藍（又稱曇慕藍）、阿麗藍梵語形式分別擬為 **Dharmārāma*、**Āryārāma*，並假定輸若干藍、阿麗跋藍的寺名分別來自 *śūnya-gama*-“空行”（或 *śūraṃ-gama*-“勇行、首楞嚴”？）以及 *ārya-varman*-“聖護、聖鎧”。鑒於《記集》同卷《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并雜事共卷前中後三記第十三》（下稱《前中後三記》）稱“太歲己卯（379），鶉尾之歲，十一月十一日在長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訖。僧純於龜茲佛陀舌彌許戒本，曇摩侍傳，佛念執胡，慧常筆受”，伯希和（Pelliot 2002）將上引序文繫於該年，甚有見地⁽⁷⁰⁾。彼時“王宮彫鏤，立佛形像”，王權、佛教高度統合。最近筆者從法藏庫車伏盧文殘簡 Pelliot bois inscrits série C9 讀出該殘契或判決文書涉及一名跟隨棲止 *Āryārāma* 精舍比丘尼的童子（疑為女童，

新的一面，亦即不僅為貴族女性提供政治聯姻之外另一種出路，還順便限縮了西域北道高門望第彼此的婚嫁聯結。

(68) 《記集》卷一一，1995 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410–411 頁，此處句讀、用字參酌《大正藏》而微有調整。各本所記僧口人數稍有出入，茲不一一指述。又，《記集》卷二將該尼戒以及道安作序之《比丘大戒》（即《十誦比丘戒本》）一概記為晉簡文帝世（371–372）譯出均有誤，不排除是後人困惑於鳩摩羅什生卒年而調整了年份。拙作（慶 2017a: 6）一度將東晉孝武帝（373–396）誤植為“西晉孝武帝”而未釐定，今案：負責筆受之慧常 373 年仍身在涼州（《記集》卷七，271 頁），遲至太元元年（376）始與道安相會（《記集》卷七，266 頁），故而龜茲尼戒之譯出仍應以 379 年為是。

(69) 湯 1938: 280, 286。僧純疑即 391 年參與《阿毘曇心》翻譯的支僧純，事見《記集》卷一〇，378 頁。曇充待考。

(70) 是則不妨估計鳩摩羅什至遲于 360 年出生——倘使我們假定他 379 年受具戒，並同意湯用彤（1938: 286）判斷，即該年僧純、曇充把戒本從龜茲帶到關中並立即獲譯。又，《前中後三記》之後記云“秦建元十五年（379）十一月五日，歲在鶉尾，比丘僧純、曇充從丘慈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此授大比丘尼戒儀及二歲戒儀，從受坐至囑授諸雜事，令曇摩侍出，佛圖卑為譯，慧常筆受。”佛圖卑或許有可能是竺佛念之梵名，疑為 **Buddhaviṇṇa*（或 **Buddhaviṇṇāna*？），這使人考慮萬度歸西征時逃往龜茲的焉耆王鳩尸卑那是否為梵語 **Kuśiṇṇa* 或 **Kuśiṇṇāna* 的音寫。

但是足以甄別性別的語尾部分模糊不清，殘文擬轉寫為 *aryarama vihāre nivaṣiga bhikṣoṇya aṣānagiya kom[ā] ///*，證明阿麗藍確實存在，從而上述序文縱然有所美化，亦應含有相當程度的史實⁽⁷¹⁾。

該序稱龜茲（依“丘慈”而給作 OC *k'iwā-dziā*, EMC *k'uw-dzi/dzi*）為拘夷（EMC *kuṣ-ji*），極為特殊。“拘夷”通常翻譯釋迦牟尼涅槃所在（梵語 *Kuśinagara*），又譯拘夷國、拘夷城、拘夷那竭或拘尸、拘尸國、拘尸那竭等。三國時代以降，該印度城邑即多翻為“拘夷”。顧及法顯音寫焉耆（EMC (?) *ian-gji*，已知唐代以後焉耆語寫作 *Ārsi*）為焉夷，龜茲（龜茲語 **Kūsi* 或 **Kūsi*，派生形容詞 *Kūsiññe*⁽⁷²⁾）寫為拘夷似無不可。不過，唐代以前“龜茲”的梵語（*Kuci*）、犍陀羅語（尼雅方言 *Kuci*、龜茲方言之佉盧文寫法可轉寫作 *Koci* 或 *Kuci*）、粟特語（名詞 *'kwc'*；形容詞 *'kweyk*, *'kwc'n'y ~ kwc'ny*⁽⁷³⁾）皆採用 <c> 拼寫。倘使 *Kuci* 正是有史以來的本地發音，那麼中古時期出現的龜茲語形式反映洎漢晉以降的某個時期開始，當地人有意或無意混淆了龜茲、拘尸發音。

這項猜想看似荒誕，卻非無例可援。伯希和早已懷疑姑墨之所以翻為劍幕，乃是模仿印度知名城邑 *Kamboja* 所致，從而“拘夷”作為唐代以前佛教界對於龜茲的正式寫法（*orthographe*）也是出於類似的“幻想地理（*géographie fantaisiste*）”（*Pelliot 1923: 130*）。淺見亦以為，既然連于闐都產生了深具神話色彩的梵名解說（即“地乳”，見季 2000: 1006–1009），龜茲人要是沒有想過如此攀附反而有些不可思議了。不過拘夷不應該算是龜茲在中國佛教界的正式名稱，其混淆僅見此序以及《記集》卷二之相應書目、還有卷一一作者不明之《前中後三記》⁽⁷⁴⁾。均與道安在 379 年前後組織的譯場有關。因此我們也該衡量伯希和（*Pelliot 1923: 126*）猜想過的另一種情況，即龜茲古音甚接近于漢語“丘慈”之上古音 *k'iwā-dziā* 以及《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記述的屈茨（EMC *k'ut-dzi*）⁽⁷⁵⁾。這麼一來，我們便不妨考慮其發音、釋名在龜茲佛教化過程中一邊向印度拘尸城名靠攏的同時，一邊也引發立意澄清龜茲、拘尸分別的學究派立場而規定將前者在梵語、犍陀羅語的官方採用形式固定為 *Kuci*。玄奘強調“正言屈支（EMC *k'ut-teiā/tei*, LMC *k'yt-tṣi*）”恐怕便是接納了後一種立場。不過這個問題牽涉到當時佉盧文、婆羅謎文等各種文字代表的具體音值以及古漢語構擬之妥貼程度，現階段難以繼續深入探索有關議題。

法顯並未巡禮龜茲——這可能是因為當時龜茲、秦土仍然交惡——否則我們便能更加理解 5 世紀初的當地情況。承緒論，這個階段看來是龜茲佛經抄寫與製作量顯著增加的年代，也是婆羅謎字西域北道字體發軔以及龜茲語佛典出現的重要時期⁽⁷⁶⁾。顧及 3 世紀中期以降，中原群雄割據，貴霜衰弱，游牧勢力亦不安定，我們可以設想城郭諸國借此權力中空時期，各自培植實力並競爭彼此之地位

(71) *Pelliot bois* 系列介紹參見 *Pinault 2007*。筆者於第十八屆國際佛教學會（*IABS*）大會上報告了該系列所含重要佉盧殘簡的基礎釋文（多倫多大學：2017 年 8 月 20–25 日），之後又藉 2018 年 3 月 12 日、13 日分別於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及英國亞非學院（*SOAS*）南亞系公開演講之機擇要發表，各件內容將另行撰專文闡析。

(72) *Pinault 1987: 20–21*。該氏（*Pinault 2002a*）後來進一步撰文澄清龜茲語之形容詞 *kucāññe* 非指龜茲，故而目前龜茲語中確實表示“龜茲”的語幹只有 **Kūsi*/**Kūsi*。

(73) 最新例證參見 *Sims-Williams and Bi 2018: 85–86*。

(74) 分載《記集》卷二，46 頁；卷一一，417 頁。後世引用者不在此限。

(75) 原文參見陳 2007: 39。

(76) 有關研究回顧參見慶、江南 2018: 159–165。

次序。這個現象在龜茲佉盧木簡亦有跡可循：在已經大致破譯的木簡之中，龜茲王典型稱號是 *Kocimaharaya-devapotra*，即“龜茲大王天子”（其中 *o* 均不妨理解為 *u*，參見慶 2014、慶 2018a）。這類木簡頻繁出現官號 *Gušura*（往往可以轉寫作 *Gošora*，尼雅佉盧文作 *Gušura*），更凸顯龜茲借鑑貴霜官制的可能性⁽⁷⁷⁾。不過，龜茲自古設有譯長等外事機構，即使有意仿效，也未必需要以對方官僚大舉移民、避難為前提。又，盡管無法將這些木簡予以精確繫年，但既然鄯善王早已自尊大王（maharaya）暨天子（devaputra），也就是貴霜君主稱號⁽⁷⁸⁾，龜茲王大概不會落後太久。值得注意的是，龜茲尚未出現僭用伊朗色彩較濃的“王中之王”例證⁽⁷⁹⁾，而是在婆羅謎文儀式寫本與石窟題記發展出梵語稱號 *Kucišvara-Kucimahārāja* “龜茲君主—龜茲大王”（參見慶 2013a: 388 整理）。*išvara* 意為“支配者，主宰”，似乎有意強調王權天授。

佛教化龜茲王室攀附迦膩色迦的猜想無信史可稽⁽⁸⁰⁾。不過玄奘收集的兩大龜茲傳說，即金花王馭龍及阿奢理貳寺院由來，均為佛典中迦膩色迦王時期故事之變衍。前者與迦畢試王城西北雪山龍池之迦膩色迦降龍傳說不無相通⁽⁸¹⁾；後者則見諸玄奘所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Lévi 1913: 359–361）⁽⁸²⁾，只是將主角從迦膩色迦宮廷黃門改為龜茲王弟。倘若這兩者無非只是佛教故事的地方性演變，未必出於矯造，上引《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中致隸藍的出現却很難只用佛教自然流行來說明。

致隸（EMC tri^h-le^h）音聲頗近於各種鳩摩羅什傳記提到的雀梨（EMC tsiak-li）大寺，《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雀離（EMC tsiak-li/liš）大清淨，玄奘稱為昭怙釐（EMC teiaw-γə^h-li/li, LMC tšiaw-xfuš^h-li）東西二伽藍，唐代以後還有東西柘厥（EMC teia^h-kuat, LMC teia^h-kyat）寺等名稱，唐代龜茲語題記作 *cakwari*（間接格），即今蘇巴什遺址⁽⁸³⁾。雖然蒲立本（Pulleyblank 1991）構擬“致”聲母為捲舌音而顯得有所扞格，不過伊朗文獻學者已經指出該聲母可以對譯中期伊朗語的 *č*（Yoshida 2003: 161; Sims-Williams 2016: 276），因而仍然不妨與“雀梨”等形式連繫。已知“雀梨/雀離”音聲與《後漢書》所記班勇自南道北上伐焉耆途經之爵離（OC tšäuk-līa, EMC tsiak-li/liš）關相似，而至少就佛經漢譯習慣來說，也和傳說中迦膩色迦王在犍陀羅所建“西域浮圖，最為第一”的雀離（或雀梨）佛圖一致。伯希和（Pelliot 1934: 89–90）曾推測三者音聲雷同是因為具有同樣的“吐火羅語”詞源。盡管筆者（慶 2011）同意伯希和該文關於爵離關位置的判斷，即位於漢代焉耆境內，或至少焉

(77) *Gušura*（庫車出土梵語寫本作 *Gaušura*）與貴霜初期君主頭銜 *Kujula* 的關係尚未徹底解決，參見 Burrow 1937: 87–88。癥結之一在於其開頭聲母何以濁化。

(78) *devaputra* 指諸神後裔而言，意涵與中國“天子”不同。3 世紀貴霜王仍稱“天子”（內田 1972: 17），而貴霜君銜最新歸納見 Jongeward and Cribb 2015, esp. 23–25。

(79) 大夏語 *paovavdi paō* 見 Sims-Williams 2015。鄯善、于闐語權則有例外，其犍陀羅語 *rayatiraya, maharayatiraya* 例證見馬 1990: 74, 93–94；于闐語例證見吉田 2006: 62–63。又參見段晴、才洛太 2017: 299–300。

(80) 一些學者認為迦膩色迦的龜茲語、焉耆語形式均為 *Kanaške*（Carling 2009: 99）。若然，則吐魯番勝金口出土所謂“歷史文化”龜茲語寫本殘片 THT432 以及焉耆碩爾處克出土焉耆語不明佛教故事殘片 THT682 均可能涉及二種語言文學傳統中流行的迦膩色迦傳說，惟情節不甚明白。

(81) 降龍傳說文長不錄，見季 2000: 149–150。可資比較的還有迦濕彌羅開國傳說（慶 2013a: 416，參見季 2000: 324–325）以及犍陀羅、烏菴等地龍池、龍泉故事，不贅。

(82)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故事見 T.1545 (XXVII) 593a15–25, j. 114，並參見 cf. T.1559 (XXIX) 238c8–9, j. 12。正如烈維（Lévi 1913: 376）論述的，其近似情節乃是假借所致。

(83) 詳見慶 2011、新疆龜茲研究院等 2014。

耆、龜茲交界；然而就整個關於“吐火羅”命名爭議的主軸而言，還是烈維（Lévi 1913: 376）看法更加合理，即龜茲雀梨大寺乃仿白沙瓦所建或命名者⁽⁸⁴⁾，就算是龜茲該寺建造增加了若干房舍結構而不僅是一座浮圖。4 世紀 70 年代，該寺僧侶人數大約相當於最大僧寺達慕藍的三分之一，或許新建不久，抑或是當時規劃的僧房相對有限；待及玄奘巡禮，其東寺佛堂已供奉佛足履跡玉石，並成為佛教徒巡禮參拜的重點之一。這種聖物的出現，應該會伴隨著佛陀在世時來到龜茲或者涅槃後降臨該地的傳說，可惜玄奘未採。

實際上，《大唐西域記》所載龜茲、于闐二地佛教傳說數量不成比例。這乍看似可歸因為玄奘去程匆忙，無暇充分尋訪耆舊，不過最近魏義天（de la Vaissière 2010）論證玄奘於 629 年從長安出發後，在龜茲一帶度過了當年秋冬，因此或許正如榮新江在拙作（慶 2017a）序言提及的，該地資料在《大唐西域記》之寡少乃是大乘教徒玄奘力加貶抑龜茲所致。不過，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龜茲佉盧殘簡所見“在足相(?)精舍”(patalakṣaṃna vihāra[m]i) 字樣⁽⁸⁵⁾，或可證明早在佉盧文流行時期，龜茲已經發展出聖蹟崇拜⁽⁸⁶⁾。換句話說，從某個時期開始，龜茲上層階級不再任由佛教傳播，而是能夠意識到護持佛教的現實利益，藉此維繫並拓展王國聲譽。在歷史學家眼裡，這或許不過是當初烏菟、犍陀羅等西域地區創造眾多佛跡與本生故事之折射反響，雪山南北早已不乏事例（參見桑山 1990: 75, 289–291）；然而從教義積極面上闡述，龜茲王室畢竟勇於承擔支持佛教的任務。法顯在錫蘭聽取的佛鉢隱現寓言（參見章 2008: 127）便透露 5 世紀初于闐、龜茲等地承繼法運議題上的隱性競爭，故而雙方長期各執大、小乘為主流，恐怕不單是教義偏好，亦有政策向背考量在內（慶 2017a: 416–417）。由此觀之，淺見以為佉盧文之所以持久存續龜茲，未必純然是印度文化圈周緣的餘波蕩漾，亦有可能出於當地統治階級對於佛教徒論述中貴霜先王功業的異常堅持。

難於理解的克孜爾石窟某地段古名“耶婆瑟難”（龜茲佉盧木簡轉寫作 Yurvaṣka (TS42)、Y[ru]rpaṣka (Kha 4)、Yorpaṣga* (Kha 6)；龜茲語 Yurpāṣka*，參見慶 2014）或許便該放置在這樣復古而佛教化的思維來解釋：該地名難以用龜茲語知識分析，字尾 *ṣka* 的出現則很難不令人聯想到貴霜早期王者帶有的 *-(i)ṣka* 詞綴（大夏語 *-(ṇ)ḥko*）⁽⁸⁷⁾。不論耶婆瑟難究竟是非常古老的龜茲地名，還是龜茲佛教徒附會或創造的擬古名稱⁽⁸⁸⁾，其所以能夠長久沿用到 8 世紀，最合理的解釋恐怕還是當

(84) 亦參見白鳥 1970b: 506。很難說漢地佛教徒最先聽說的“雀離浮圖”究竟是哪一處。要是漢人很早聽說龜茲有寺塔，其音寫可能更接近於龜茲發音而非印度文化圈的通行發音。至於相傳迦膩色迦所建窠堵波的原始名稱，寧梵夫（Deeg 2005: 233, n. 1163）見解可備一說，即本自建塔材料，也就是印度人觀念中十分神聖的牛糞（梵語 *śakṛt*）。附帶一提，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一解那爛陀大寺西南一處小制底乃婆羅門執雀請問處，以此釋雀離浮圖，頗為穿鑿（Pelliot 1934: 79–81）。今案：義淨得以勉強附會的根據似乎是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然依聖道可般涅槃，故四定記皆不應理。如離繫子（Nirgrantha-srāvaka）問雀死生，佛知彼心，不為定記”（T.1558 (XXIX) 156b4–6, j. 30）。

(85) 梵語 **pāda-lakṣaṇa-*，字面意為足相、足印，雖然通常表示足印的梵語是 *pāda-mudrā-*。錄文見慶 2018a: 49。該簡出土信息不明，無從核定是否為克孜爾、蘇巴什或其他庫車遺址出土者，而該精舍或寺院又是否確實指示的是出土遺址所在。

(86) 早期漢譯佛典記載佛陀在世時變化游履範圍之北境是犍陀羅。相關討論甚多，例如榎 1958；桑山 1990: 75–84。

(87) 學界仍然無法充分解釋該詞綴。相關問題至少包括于闐語詞綴 *-škā* 以及龜茲語詞綴 *-ške*、*-ṣke* 的辨析，參見 Sims-Williams 2002: 237–239。該氏假定這些詞綴均來自一種未知伊朗語，不排除與奄察之類的斯基泰人有關。持異說者尚有 Tremblay (2005: 431–432) 等人，最新討論參見 Pinault 2015。

(88) 筆者能想到的類似例子是唐代龜茲僧利言《梵語雜名》將“突厥”的梵語形式給作 *Turuṣka*，本義是蘇合香。

地人甚是鍾意其發音帶有的印度—貴霜風韻。只是當地不復保存迦濕彌羅地區那樣完整的王朝史料⁽⁸⁹⁾，無從追尋它最初蘊含的命名傳說。雖然如此，在討論公元前後貴霜、龜茲二地居民互動以及天山游牧民族的連環遷徙以前，我們首先應當考慮西方文化在龜茲人形塑自身歷史過程中產生的影響，始能充分掌握有關課題。

（2）龜茲社會的商業性格

4 世紀下半葉之龜茲甚富庶。《呂光載記》云：“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⁹⁰⁾。此句疑化自《漢書·大宛列傳》“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⁹¹⁾，而不無溢美之嫌，然而龜茲作爲康居、大宛通向中國的重要轉運站，當地有大酒窖並不讓人意外。承魏義天（de la Vaissière 2004: 84–85）所論，迄及 2 世紀末，中亞商貿主要由貴霜商人（包括印度商人與巴克特里亞商人）掌握，粟特人的參與只是邊緣性的；3 世紀以後粟特人角色愈加重要，並在 4 世紀以降趨於主流（亦參見吉田 2011: 51–52, 66）。在這個過程中，龜茲居民對葡萄酒的愛好或許早已爲西域商胡開發，只是直到十六國時期才受到史官注意。有趣的是，相對於吐魯番、尼雅、營盤等地早已出現豐富的葡萄種植證據或者第一手文字記錄（參見 Trombert 2001–2002, Trombert 2005），龜茲語葡萄一詞尚未獲得確證，其栽培或釀造業在 7 世紀之前的考古學證據也十分缺乏⁽⁹²⁾。不過，龜茲語“酒”（*mot*，可泛指各種酒類）形式與表示葡萄酒的伊朗語詞相近，例如大夏語 *μολο*、粟特語 *mōw/maδu/*⁽⁹³⁾。這使人考慮龜茲在古代葡萄酒運銷網的地位更接近倉儲與消費中心而不是主要產區，從而呂光兵士見到的窖藏可能爲富商所有，包括盤據當地的外國商胡。

各種間接證據顯示 5 世紀上半葉龜茲、焉耆逐漸復興，國勢太平。其富足似乎引起悅般覬覦，從而聯合北魏攻打柔然並進而攻擊塔里木盆地，結果焉耆於 448 年遭北魏沉重打擊，龜茲則似乎僥倖以財賄賂而免於王族出逃之災⁽⁹⁴⁾。《魏書·西域傳》焉耆條云⁽⁹⁵⁾：

(89) 例如 *Rājatarāṅgīnī* 保存的 *Huška*（一般認爲表示胡韋色迦）、*Juška*、迦膩色迦等古王傳說，見 Stein 1892: 30。

(90) 《漢書》卷一二二，3055 頁。

(91) 《漢書》卷九六上，3894 頁。

(92) 慶 2017a: 372–376。營盤漢晉時期墓地的葡萄種植證據（新疆考古研究所 2002）承魏義天（É. de la Vaissière）教授 2018 年 3 月 12 日講評提示，在此致謝。

(93) *BD II*: 235。承辛維康（N. Sims-Williams）2018 年 3 月 21 日指教，過去學者往往視 *mot* 爲粟特語借詞，但其實他們所依據的粟特語幹 *mwδ-*“酒”（例如 Schwartz 1974: 407; Tremblay 2005: 438）出自 *Ancient Letter IV* 之誤讀，該處出現的 *mwδy* 應指價格（Sims-Williams 2017: 174）；又，理論上粟特語 */maδu/* > */muδu/* 只會發生於晚期階段，故而龜茲語 *mot* 的直接來源未必是粟特語。

(94) 《魏書》卷一〇二，2017 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2456–2460 頁。

(95) 《魏書》卷一〇二，2456–2457 頁。案：焉耆何時殺北魏使不明，却可以看出官方對於北魏西拓的負面態度。龜茲條載“其東城戍，寇竊非一”（2457 頁）似亦說明二國彼此勾結，擾亂魏使。據此，很難說董琬西使時究竟是否通過焉耆一龜茲路段，或者設法繞道。奇特的是 437 年陸續來使的西域十一國雖然包含龜茲、焉耆，于闐卻不在其列。就像曹魏時期崔林顧慮的那樣，這些來使是否間雜“疏屬賈胡”（《三國志》卷二四，680 頁）值得深思。

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世祖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齋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回、尉犁二城拔之，進軍向員渠。鳩尸卑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拒。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卑那眾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翫殊方譎詭不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初鳩尸卑那走山中，猶覲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爲度歸所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婿，厚待之。

所謂“不亂日久”，正說明焉耆、龜茲二國在柔然、鮮卑等游牧民族此前角逐過程中處於相對安穩的位置。若《魏書·食貨志》可信，這場對焉耆、龜茲之戰是中國史上少數有效靠西征賺取國用的軍事行動之一⁽⁹⁶⁾。龜茲若果真能在呂光征服以後六十年內重新茁壯，則不僅貿易活躍、經濟殷實，稅政、戶政應該也能有效運作，才能在支持佛教事業之餘有所盈餘。這個繁榮階段至少持續到 5、6 世紀之交，塔里木盆地正式面臨嚙噠攻勢爲止。在柔然、吐谷渾、高車等勢力同時角逐之下，焉耆遭嚙噠陵夷，而龜茲臣服經過不明⁽⁹⁷⁾。不過克孜爾石窟後山區 211 窟正壁 *Antewa* 王炭筆肖像畫稿及其相應婆羅謎文題記 Kz-211-ZS-Z-01（龜茲語）、02（梵語）也許反映了這段歷史氛圍⁽⁹⁸⁾。2011–2018 年，荻原裕敏根據德國亞州藝術博物館提供的探險隊照片製作該窟右側壁婆羅謎文龜茲語詩篇的解讀初稿，編作 Kz-211-ZS-R-06。筆者在最後的釐定、編輯階段中注意到其內容可能反映某位佛教徒有感於末法時代來臨，在當地拓展石窟、樹立功德⁽⁹⁹⁾，而敘事對象之不明第三人稱不排除正是指該窟之龜茲王肖像。在畢麗蘭（Lilla Russell-Smith）與德萊雅（Caren Dreyer）二位博士協助下，筆者取得肖像右側（以肖像視線爲準）佉盧文題記的高精度探險隊照片影像，茲擬重新解讀並翻譯如下⁽¹⁰⁰⁾：

kriya[m a]m[t](*)e[va] ? rza [n]amma agñirgo[ch]ra[m]im (*m)[r](*)da te) vihar[e] gza_o tra tvārda_o tvam catyāṃgza_o gamethā pañk[a] na praçim vyamsañkam yimam suka statvya [tha]mhamcyā toñka_o mi vutaṃmam manyāṇa /// [正壁至右側壁轉角，未入鏡] /// .ā dhiyaṃ[n]ī

[這幅]作品[是] *Aṃteva*，名爲 ?-*rza*。他[逝世]於焉耆境內 (**Agnir*=*gocara*)⁽¹⁰¹⁾。國人匆匆(?) 在[這座]精舍(或:寺院)予以入葬(?)。(他的)前方不[再]陷於[生死]泥塗。他應該[永遠]保持

⁽⁹⁶⁾ 《魏書》卷一一〇，3105 頁。該處稱“度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環詭之物億萬已上”。

⁽⁹⁷⁾ 段連勤 2006: 185–190。結合王素對於麴氏高昌的定年及相關新出史料，筆者基本上仍然同意焉耆之破滅處於 5、6 世紀之交，即麴嘉登基（501）之前不久。

⁽⁹⁸⁾ 荻原與筆者初步釋讀見慶 2013a: 398–399，正式編號與錄文修訂見《龜茲石窟題記》，待刊。

⁽⁹⁹⁾ 肖像示意圖參見慶 2013a: 399; Kz-211-ZS-R-06 錄文與翻譯參見荻原 2018，進一步討論詳見《龜茲石窟題記》。

⁽¹⁰⁰⁾ 舊錄見慶 2013a: 399。此處 _o 表示題記出現的特殊提耳形尾筆；“thā”表示字符 <thā> 上方出現有待解釋的兩點，音值待定。tvārda_o tvam 疑爲梵語 *tvarita-tvaritam* “疾忙”之奪訛。catyāṃgza_o gamethā 可能想表現的是梵語 **cetya-kṣā gamita* “送到支提之處”(?), 雖然這看起來並非十分道地的梵語。[tha]mhamcyā 則似乎表示山岳（梵語 *tuñka-*）之名並可以理解爲 **ṭhamhamcyā*，是則詞幹爲 *ṭhampha** 或 *ṭhamham**。該名是否可以勾連到高昌北部之貪汗山，而龜茲人又是否曾將境內高峰冠以相似名稱，待考。

⁽¹⁰¹⁾ 若此處過去分詞兼過去式 (*m)[r](*)da “死亡”之復原大致無誤，則該王之死不排除與嚙噠滅焉耆有關，即親往支援盟國而不幸在該地犧牲，待考。

這樣的喜樂，[應該?]在 *[t̪ha]m̪ha(m)* 之山頂受到尊敬(?) /// 應該予以緬懷。

據此，該窟之所以基本保存原狀可能確實是為了紀念該王，後來由於某些歷史條件而沒有繼續敷整，而正壁之佉盧文、婆羅謎文題記顯示該王逝世前後相當於二種文字之併用期。又，若此次佉盧文題記之嘗試破譯大致不差，則 *Aṃteva*（婆羅謎文梵語題記作 *Antewa*）可能和 *Yāśas*（龜茲語 *Yāśe*，參見慶 2013a: 414–415）類似，是龜茲王者嗣位後冠用的名字，從而龜茲史上 *Aṃteva* 王未必只有一人。在這個情況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考慮呂德斯（H. Lüders）從庫車出土梵語寫本讀出的龜茲王 **Artep*（梵語形式應解作 *Artepa*，慶 2013a: 389）其名諱是否為 *Aṃteva* 更加本土化的形式，抑或相反——*Aṃteva* 乃是 *Artepa* 的擬印度風格名稱。

不論如何，龜茲地區在嚙唎控制期間仍然有所發展。《梁職貢圖》繪製之龜茲國使名為“康石憶丘波那”⁽¹⁰²⁾，不排除是當地粟特移民。至遲到這個時期，龜茲佉盧文書制度應已充分成熟，寺院也管理有序。反覆遭受書寫利用而年代難以確定的法藏龜茲佉盧文殘簡 *Pelliot bois inscrits série C7* 在最後一次利用時，在木簡右緣留下了一排人名：

- (1) [G]ośora .o r. [ya] ?
- (2) [Tsa]pa[rga]
- (3) Śa[m]ma[r]oci
- (4) soliya Cirka ma ///

第 3 行 Śa[m]ma[r]oci 相當於梵語 *Śama-ruci-*“寂樂”。名單用意不明，然而 *soliya* 應可理解為 *sulīya* “粟特（人）的、商人的”。*Cirka* 似為粟特人名，來自粟特語 *cyr* /čēr/ “英勇、勝利”⁽¹⁰³⁾。其人未必是佛教徒，却不妨視為粟特商人在龜茲最早的第一手記錄。之後龜茲社會顯得更加西化、商業化，不但設有“女市”⁽¹⁰⁴⁾，“無田者則稅銀錢”⁽¹⁰⁵⁾，並且“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¹⁰⁶⁾。負有稅官以及交易監督官功能的 *Guśura* 一職持續到佉盧文、婆羅謎文並行時期。其職能未必涉及關津，因此盡管 7 世紀上半葉通行許可證未見蹤跡，却很難說當時該官職是否已經廢止。又，龜茲城區遺址出土疑似粟特祆教徒遺物（Kageyama 2005，該氏判斷更靠近 7–8 世紀而非 5 世紀），還出現一件陶盆口緣上的粟特語—粟特文暨龜茲語—婆羅謎文墨書銘文，與布施有關（荻原 2014:

⁽¹⁰²⁾ 錄文從余 2003: 56。倘使龜茲王以及滑國王妻均派遣粟特人為使節，則其個別肖像的五官面貌未必足以凸顯其代表王族或境內主體族群。我們或許需要考慮的是粟特人是否在成為突厥以及唐朝經營西域的重要媒介以前，已經在嚙唎政權中扮演了類似的中間人角色。

⁽¹⁰³⁾ 粟特語 *cyr* 可作人名，亦衍生出人名 *cyrk* /čērak/（Lurje 2010: 170–171）。筆者原擬將簡面字跡分斷為 *Cirka[ma]* 並考慮是否為粟特語 *cyr* /čēr/ 和 *k'm* /kām/ “意志”的複合，茲從辛維廉（N. Sims-Williams, p.c. 21/03/2018）教授建議，視為 *cyr* 附加後綴者。另一枚嚴重受損的 C8 為林棲僧（龜茲佉盧文轉寫作 *aramnya*）名籍，用途不明，理論上不排除用於登記稅收、戶口、布施亦或是安居名單等等。其背面出現殘字 *devira* “典、書手”，是為龜茲佉盧文首例。

⁽¹⁰⁴⁾ 《魏書》卷一一二，2458 頁。《魏書·西域傳》龜茲條復原參見余 2005: 448。

⁽¹⁰⁵⁾ 《周書》卷五〇，1971 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917 頁。

⁽¹⁰⁶⁾ 《隋書》卷五〇，1973 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852 頁。

274), 似可推測中古龜茲的粟特移民人口逐漸增長, 佛教徒比例也愈趨上升。

(3) 龜茲的漢文化底蘊

龜茲佛教化之後仍然與中國內地保持聯繫。已知當地與高昌、河西地區等區域互通商旅、僧徒, 現代庫車市區更發現漢式墓葬。整理者擬繫於 3–4 世紀, 墓主則可能是河西豪族或是受到漢地文化影響的龜茲貴族 (新疆考古研究所 2013: 54)。墓葬並未出現漢式半兩錢、五銖錢以外的文字資料, 不過這項重大發現促使學者重新考慮魏晉南北朝時期龜茲與東土在制度、文化與技術上的聯結。最明顯的例子, 便是龜茲看來在發展龜茲語佛典書寫的早期階段便傾向選用紙而非傳統的貝葉、樺皮等材料⁽¹⁰⁷⁾。盡管現存龜茲語文獻多為佛教經籍與寺院文書, 漢文化隱而不顯, 不過最近筆者重新解析克孜爾尕哈第 25 窟赭紅色大題記 Kg-025-ZS-R-01 的法國探險隊照片影像時, 注意到有趣字眼⁽¹⁰⁸⁾:

¹šak-ñ(u kšu)[ñntsa] Svarṇadeveṃ lāñntsa postanont škasce ok meññantse mewye pikulne šuppenkāmñesa lāntsi ²wawāñntsa [約 2 個剥落字符] – tta ri [w]t⁽¹⁰⁹⁾ kom ai Kaṃk[o]k[nts]e caitikendane kameṃ tumñ pyāpyaisa pattim wñnaṣṣāmñesa Kem-³kariśsa wārñaisa pañikteṃ kākṣiñntse yarke maṣṣare pañikti tākoym taisem akesont yaṃ [約 2 個剥落字符] –⁴[ke]m[p]a mā [š]im(tār)

蘇伐疊王十九年 (642 壬寅, 唐貞觀十六年) 閏六月八日, 虎年。從事 *šuppenk 的織師們……來到了…… Kaṃk[o]k* 的火葬薪柴堆 (?), 為時兩天。藉著以香料、花卉向步兵們致禮的時機, 以 Kemkariś* 為首的諸人 (用香華) 禮敬師尊佛陀。願我們成佛, 並且但願最後……不會跟……一起來。

新讀出詞語 *šuppenk 像是漢語“戍兵”(EMC euṣh-piaŋ) 卻不大像是唐人習語。如果它確實是漢語借詞, 有可能是在更早的時期進入龜茲人語彙。今後我們有必要加強探索龜茲出土文字資料中反映的各種文化因素, 以適當評估龜茲文書的特性及其兼容並蓄之特徵。

5. 結語

自《漢書》首載龜茲史事以來, 該地王室即進行書面外交, 置譯長四人。公元 158 年《劉平國碑》之鑿刻, 有可能是龜茲借漢字代表的漢帝國聲威震懾北方勢力。其後佛教發展, 西化增強, 但統治階級疑似趁貴霜衰弱, 利用“龜茲”、“拘尸”及“爵離”、“雀離”之音聲接近, 將本地塑造為佛教勝地並自負為傳統佛教護持者。或許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即使婆羅謎文早從 4、5 世紀開始便使用於文獻傳抄與創作場域, 亦逐漸使用於寺院帳簿、買賣契約等文書類別, 佐盧文作為早期貴霜

⁽¹⁰⁷⁾ 筆者回顧參見慶、江南 2018: 163–164。

⁽¹⁰⁸⁾ 已知唐貞觀十六年無閏, 可證唐伐龜茲前夕的當地曆日近似漢地系統, 但置閏有所區別, 參見 Ching 2016: 56 n. 56。又, 這道題記記錄的事件不排除涉及該年九月乙毗咄陸可汗之軍事擴張, 拙考見《龜茲石窟題記》。其中 caitikendane 或許是 caitikendaṃ* 處格, 疑化自梵語 caitika- 和 indhana- 之並舉連聲。kaṃk[o]k* 疑即“監國”(EMC kaim/ke:m-kwək), 可能指當時的龜茲太子或攝政王。

⁽¹⁰⁹⁾ tta 或可讀為 nta。[w]i 或可讀為 [p]i。

佛教文化的象徵之一，在當地持續行用了較長時間。不過，本文提出的討論與其說是進行文獻考證，不如說是提出一種設想。天竺、吐火羅乃至粟特商胡是否曾經左右龜茲政策與宗教傾向，仍然是今後必須思索的問題。

7世紀上半葉大量龜茲語通行許可證木簡的產生，意味著佉盧文和犍陀羅語的退場。此時龜茲臣屬突厥，然而其控制方式似以授予王族官號、限制王者服制並征取稅賦為主（松田 1970: 274–275）。理論上不排除突厥干預王室繼嗣與婚姻的可能性，可是在本地行政文書與寺院紀錄却看不出明顯干擾。通行證雖然出現一些疑似突厥系名字的行人，却難以看出顯著的突厥宰制痕跡（慶 2013d。又參見慶 2017a: 402–404）。宏觀來說，龜茲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動模式可能從匈奴、烏孫強盛時期以來便已大致成形，亦即形式上有所隸屬，不過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行政權以及本地職官體系。被《梁職貢圖》描述為“無職官”“所降小國，使其王為奴隸”（錄文參見余 2003: 51）的嚙唃，其控制模式可能有所類似，從而龜茲行政上使用佉盧文的習慣也沒有驟然加以改革的跡象。佉盧文和犍陀羅語的退場可能是當權派不復守舊，轉而喜好使用更具本土特色的語文和字體，亦可能是為了與國際現實全面接軌——實際上大約從貴霜晚期（公元 230 年以後）開始，婆羅謎文便逐漸成為中亞貨幣最常選用的印度系文字（Jongeward et al. 2015: 149–151），而此前它早已在印度相當盛行。

粟特文也在中古龜茲也有所通行。唐代官員觀察當地人“學胡書及婆羅門書、算計之事，尤重佛法”⁽¹¹⁰⁾，其“胡書”疑即指粟特文而言。待及安西大都護府時期，漢文重新推廣，以致於出土文物很少出現能夠確定寫在這個時期的龜茲語官文書，能夠認為漢語—龜茲語雙語文書者更是幾乎一件也沒有。雖然這很可能是因為探險隊過於側重佛教遺址所致，其比例畢竟與和田出土品所見者大相逕庭。其行政在龜茲之得以有效展開，不只是因為該地區本來置有漢朝軍事重鎮，唐代粟特裔吏民的居間斡旋亦當功不可沒（慶 2013c, 慶 2018b）。總而言之，龜茲地區自古以來汲取東、西方文明特長，發展出具有特色的書寫文化，其在西域文化史上的影響力值得學者今後繼續探究。

參考文獻（以英名字母為序）

- BD = Nicholas Sims-Williams, *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3 vols. Oxford/London: The Nour Founda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Azimuth Editions. 2002–2012.
- Burrow, Thomas
1937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ling, Gerd, Georges-Jean Pinault and Werner Winter.
2009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of Tocharian A*. Volume 1: A–J. Wiesbaden: Harrassowitz.
- Chen Huaiyu 陳懷宇 and Rong Xinjiang 榮新江 (eds.)
2018 *Great journeys across the Pamir Mountains: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Zhang Guangda on his eighty-fifth birthday*. Leiden: Brill.
- 陳 橋驛 Chen Qiaoyi
2007 《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
- 慶 昭蓉 Ching Chao-jung
2010 *Secular documents in Tocharian: Buddhis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Kucha region*. Dissertation thesis,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 Études.

⁽¹¹⁰⁾ 《舊唐書》卷一九八，1975 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5303 頁。

- 2011 《重議柘厥地望：以早期探險隊記錄與庫車出土文書爲中心》，《西域文史》6: 167–189.
- 2013a 《龜茲石窟現存題記中的龜茲國王》，《敦煌吐魯番研究》13: 387–418.
- 2013b “Reanalyzing the Kuchean-Präkrit tablets THT4059, THT4062 and SI P/141”,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14: 55–94.
- 2013c “The activities of Sogdian Buddhists in Kucha as observed in the Tocharian B secular documents”, in: M. De Chiara, M. Maggi, G. Martini (eds.), *Buddhism among the Iranian peoples of Central Asia*, 333–383.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2013d 《從龜茲語通行證看入唐前後之西域交通》，《西域文史》8: 65–83.
- 2014 《克孜爾出土德藏佉盧文龜茲王詔論與契約文書研究》，《西域文史》9: 51–73.
- 2016 “On the names of cereals in Tocharian B”,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17: 29–64.
- 2017a 《吐火羅語世俗文獻與古代龜茲歷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2017b 《離離原上草：從吐魯番與庫車出土文字資料談西域北道之草資源》，孟、朱（編）2017: 88–102.
- 2018a 《東京国立博物館所蔵クチャ・カローシュティー文字木簡について》，《MUSEUM: 東京国立博物館研究誌》672: 45–56.
- 2018b “On the word *yau* found in the Kuchean secular documents”, in: Chen and Rong (eds.) 2018: 1–19.
- 慶 昭蓉 Ching Chao-jung、江南 和幸 Enami Kazuyuki
- 2018 《唐代安西大都護府時期之龜茲當地用紙：日本龍谷大學所藏庫車出土漢文書案例研究之一》，《西域文史》12: 157–176.
- Ching Chao-jung 慶 昭蓉 and Ogihara Hirotoshi 荻原 裕敏
- 2012 “A Tocharian B sale contract on a wooden tablet”,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5 (2010): 101–128.
- Deeg, Max
- 2005 *Das Gaoseng-Faxian-Zhuan als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Quell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 段 連勤 Duan Lianqin
- 2006 《丁零、高車與鐵勒》。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段 晴 Duan Qing
- 2016 《薩伽牟雲的家園：以尼雅 29 號遺址出土佉盧文書觀鄯善王國的家族與社會》，《西域研究》2016/3: 54–64.
- 段 晴 Duan Qing、才洛太 Tshelothar
- 2017 《佉盧文的證言：青海藏醫藥文化博物館藏兩件佉盧文尺牘研究》，孟、朱（編）2017: 292–305.
- 榎 一雄 Enoki Kazuo
- 1951 《エフタル民族の起源》，《和田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133–150。東京：講談社。
- 1958 《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1/3: 1–52.
- 1992 《月氏の副王謝：クシャン王朝年代論に關する一憶説》，《榎一雄著作集》第一卷，306–321。東京：汲古書院。
- Falk, Harry
- 2015 “Kushan rule granted by Nana: The background of a heavenly legitimation”, in: Falk (ed.) 2015: 265–299.
- Falk, Harry (ed.)
- 2015 *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 Bremen: Hemen.
- Fussman, Gérard
- 2015 “Kushan power and the expansion of Buddhism beyond the Soleiman mountains”, in: Falk (ed.) 2015: 153–202.
- 關 迪 Guan Di
- 2016 《古鄯善國佉盧文簡牘的形制、功用與辨偽》，《西域研究》2016/3: 84–93.
- 郭 錫良 Guo Xiliang（編）
- 2010 《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Harmatta, János (ed.)

- 1994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II: *The development of sedentary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 Paris: UNESCO.

黃 文弼 Huang Wenbi

- 1958 《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北京：科學出版社。
1990 《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

池田 溫 Ikeda On

- 1965 《8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1: 49-92.

伊藤 敏雄 Itō Toshio

- 2017a 《日本における樓蘭研究一〇〇年》，《歷史研究》54: 57-83。
2017b 《李柏文書の性格をめぐって：李柏文書段片群を中心に》，《中國古代史研究》8: 48-64.

季 羨林 Ji Xianlin

- 2010 《西域佛教史》，《季羨林全集》第十六卷，121-299。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季 羨林 等 Ji Xianlin et al.

- 2000 《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Jongeward, David, Joe Cribb, Peter Donovan

- 2015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 coins*.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Jongeward, David, Elizabeth Errington, Richard Salomon, and Stefan Baums

- 2012 *Gandharan Buddhist Reliquar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Kageyama Etsuko 影山 悦子

- 2005 “Sogdians in Kucha, a study from archaeological and iconographical material”, in: de la Vaissière and Trombert (eds.) 2005: 363-375.

KI = A. M. Boyer, E. J. Rapson, E. Sénart, P. S. Noble, *Kharoṣṭhi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Clarendon. 1920-1927.

桑山 正進 Kuwayama Shōshin

- 1990 《カービ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2017 《貴霜丘就卻の歿年》，《東方學報》92: 77-134.

de la Vaissière, Étienne

- 2004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Deuxième édition révisée et augmenté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05 《結語》（榮新江整理），《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法國漢學》10: 497-502。
2010 “Note sur la chronologie de voyage de Xuanzang”, *Journal Asiatique* 298/1: 157-168.

de la Vaissière, Étienne and Éric Trombert (eds.)

- 2005 *Les Sogdiens en Chine*. Paris: ÉFEO.

Lévi, Sylvain

- 1913 “Le « tokharien B », langue de Koutcha”, *Journal Asiatique*, 11^e série, 2: 311-380.

Loukota, Diego（王臣邑）

- 2016 《和田博物館藏源於龜茲國的一件佉盧文木牘》，《西域研究》2016/3: 65-83.

Lubotsky, Alexander and Sergei Starostin

- 2003 “Turkic and Chinese loanwords in Tocharian”, in: B. L. M. Bauer and G.-J. Pinault (eds.), *Language in Time and Space: A Festschrift for Werner Wint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0th birthday*, 257-270. Berlin/NY: Mouton de Gruyter.

Lurje, Pavel B.

- 2010 *Personal names in Sogdian texts*.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Lurje, Pavel B. and Ilya Yakubovich

- 2017 “The myth of Sogdian lambdacism”, in: The Team Turfanforschung (eds.), *Zur lichten Heimat: Studien zu Manichäismus, Iranistik und Zentralasienkunde im Gedenken an Werner Sundermann*, 319–34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馬 雍 Ma Yong

- 1990 《西域史地文物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

Malzahn, Melanie

- 2007 “The most archaic manuscripts of Tocharian B and the varieties of the Tocharian B language”, in: M. Malzahn (ed.), *Instrumenta Tocharica*, 255–297. Heidelberg: Winter.

松田 壽男 Matsuda Hisao

- 1970 《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增補版。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孟 憲實 Meng Xianshi、朱 玉麒 Zhu Yuqi (編)

- 2017 《探索西域文明：王炳華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

森安 孝夫 Moriyasu Takao

- 2004 《龜茲王國金花王と礪砂に関するウイグル文書の發見》，三笠宮殿下米壽紀念論集刊行會（編）《三笠宮殿下米壽紀念論集》，703–716。東京：刀水書房。

長澤 和俊 Nagasawa Kazutoshi

- 1983 《古代西域南道考》，護雅夫編《內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會と文化》，57–77。東京：山川出版社。
1996 《樓蘭王國史の研究》。東京：雄山閣。

中谷 英明 Nakatani Hideaki

- 1998 《足寺足僧（サンスクリット寫本から見る龜茲の佛教）》，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改訂版），187–190。京都：臨川書店。

荻原 裕敏 Ogihara Hirotoishi

- 2013 《從龜茲語通行許可證看入唐前後之西域交通》，《西域文史》8: 65–83。
2014 《《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新疆考古發掘報告》所刊吐火羅語資料》，榮、朱（編）2014: 267–275。
2018 《古代期トカラ語 B による韻文題記について》，《東京大學言語學論集》40: 153–178。

Pelliot, Paul

- 1923 “Notes sur les anciens noms de Kučâ, d’Aqsu et d’Uč-Turfan”, *T’oung Pao* 22: 126–132.
1934 “Tokharien et koutchéen”, *Journal Asiatique* 224: 23–106.
2002 “Notes sur Kumārajīva”, in: A. Forte and F. Masini (eds.), *A life journey to the East. Sinological Studies in memory of 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 1–19. Kyoto: 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Peyrot, Michaël

- 2008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ocharian B*. Amsterdam: Rodopi, 2008.
2015 “Tocharian languages”, *Encyclopædia Iranica*, online edi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tocharian-language> (accessed on 27 July 2015).

Pinault, Georges-Jean

- 1987 “Épigraphie koutchéenne, I. Laissez-passer de caravanes, II. Graffites et inscriptions”, in: H. Chao 晁華山, S. Gaulier, M. Maillard and G.-J. Pinault, *Sites divers de la région de Koutcha*, 59–196, planches 40–96.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1989 “Introduction au tokharien”, *Lalies* 7: 3–224.
1998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in Tocharian B from the Berezovsky and Petrovsky Collections”, *Manuscripta Orientalia* 4/4: 3–20.
2002a “Toch. B *kucaññe*, A *kuciñ* et skr. tokharica”, *Indo-Iranian Journal* 45: 310–345.
2002b “Tocharian and Indo-Iranian: Relations between two linguistic areas”, in: Sims-Williams (ed.) 2002: 243–284.
2007 “Concordance des manuscrits tokhariens du fonds Pelliot”, in: M. Malzahn (ed.), *Instrumenta Tocharica*, 163–219. Heidelberg: Winter.

- 2008 *Chrestomathie tokharienne. Textes et grammaire*. Leuven/Paris: Peeters.
- 2015 “The formation of Buddhist languages, as exemplified by the Tocharian evidence”, in: M. Malzahn, M. Peyrot, H. Fellner and T.-S. Illés (eds.), *Tocharian texts in contex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charian manuscripts and Silk Road culture, June 25–29th, 2013*, 117–126. Bremen: Hempel.
- Pulleyblank, Edwin G.
- 1991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BC Press.
- Reck, Christiane
- 2016 *Mitteliran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2: Berliner Turfanfragmente buddhistischen Inhalts in soghdischer Schrif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 2017 *Mitteliran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3: Berliner Turfanfragmente christlichen Inhalts und Varia in soghdischer Schrif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 榮 新江 Rong Xinjiang
- 1992 《龜茲》，《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848–849。北京 / 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1995 《龍家考》，《中亞學刊》4: 144–160。
- 2005 “*Sabao* or *Sabo*: Sogdian caravan leaders in the wall-painting in Buddhist caves”, in: de la Vaissière and Trombert (eds.) 2005: 207–230。
- 榮 新江 Rong Xinjiang、朱 玉麒 Zhu Yuqi (編)
- 2014 《西域考古·史地·語言研究新視野：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 Salomon, Richard
- 1998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 fragments in the Pelliot Collection”, *Bulletin d'Études Indiennes* 16: 123–160。
- Sander, Lore
- 2009 “Remarks on the Formal Brāhmī script from the Southern Silk Rout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9 (2005): 133–144。
- Schmidt, Klaus. T.
- 2001 “Entzifferung verschollener Schriften und Sprachen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Kučā-Kharoṣṭhī Typ B und des Kučā-Prākṛits”, *Göttinger Beiträge zur Asienforschung* 1: 7–27。
- Schwartz, Martin
- 1974 “Irano-Tocharica”, in: Ph. Gignoux and A. Taffazzoli (eds.), *Mémorial Jean de Menasce*, 399–411. Louvain: Imprimerie orientale.
- Sims-Williams, Nicholas
- 2002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its invaders: Linguistic evidence from the Bactrian documents and inscriptions”, in: Sims-Williams (ed.) 2002: 225–242。
- 2015 “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from the time of Kanishka”, in: Falk (ed.) 2015: 255–264。
- 2016a “From Aramaic to Manchu: Prehistory, life and after-life of the Sogdian script”, in: X. Rong and F. Luo (eds.), *Sogdians in China: New evidence in archaeological finds and unearthed texts* 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物的新印證，414–428. Beijing: Science Press。
- 2016b “Bactria – Balkh: Variations on a place-name”, in: Éric Pirart (ed.), *Études de linguistique iranienne. In memoriam Xavier Tremblay*, 273–281. Leuven/Paris/Bristol: Peeters。
- 2017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No. 4 and the personal name Manavaghichk”, in: A. Cantera and J. Ferrer-Lossila (eds.), *Estudios Iranios y Turanios: Homenaje a Helmut Humbach en su 95º aniversario*, 171–179. Girona: Sociedad de Estudios Iranios y Turanios。
- Sims-Williams, Nicholas (ed.)
- 2002 *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s-Williams, Nicholas and Bi Bo 畢波

2018 “A Sogdian fragment from Niya”, in: Chen and Rong (eds.) 2018: 83–104.

白鳥 庫吉 Shiratori Kurakichi

1970a 《烏孫に就いての考》，《白鳥庫吉全集》第六卷，1–55。東京：岩波書店。

1970b 《佛教東漸史上の難問題に就いて》，《白鳥庫吉全集》第六卷，504–507。東京：岩波書店。

Stein, Marc Aurel

1892 *Kaḥaṇa's Rājatarāṅgīnī: a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āśmīr*. London: A. Constable.

湯 用彤 T'ang Yung-t'ung

1938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長沙：商務印書館。

陶 喻之 Tao Yuzhi

2014 《東漢劉平國刻石研究資料匯編》，榮、朱（編）2014: 400–458。

Tremblay, Xavier

2005 “Irano-Tocharica et Tocharo-Iranic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8: 421–449.

Trombert, Éric

2001–2002 “La vigne et le vin en Chine. Misères et succès d’une tradition allogène”, *Journal Asiatique* 289/2: 285–327; *Journal Asiatique* 290/2: 485–563.

2005 “Un vestige vivant de la présence sogdienne en Chine du Nord: le vignoble du Shanxi”, in: de la Vaissière and Trombert (eds.) 2005: 261–282.

内田 吟風 Uchida Ginpū

1972 《吐火羅（Tukhāra）國史考》，東方學會（編）《東方學會創立二十五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91–110。東京：東方學會。

渡邊 哲信 Watanabe Tesshin

1937 《西域旅行日記》，上原芳太郎（編）《新西域記》，237–430。東京：有光社。

新疆考古研究所

2002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 1999 年發掘簡報》，《考古》2002/6: 58–78。

2013 《新疆庫車友誼路魏晉十六國時期墓葬 2007 年發掘簡報》，《文物》2013/12: 37–55。

新疆龜茲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1 《克孜爾尕斯石窟現存龜茲語及其他婆羅謎文字題記內容簡報》，《西域文史》7: 1–17。

2013a 《新疆龜茲研究院藏本簡調查研究簡報》，《文物》2013/3: 25–52。

2013b 《克孜爾石窟後山區現存龜茲語及其他婆羅謎文字題記內容簡報（一）：第 203、219、221、222、224、227、228、229 窟》，《敦煌吐魯番研究》13: 341–369。

2014 《蘇巴什石窟現存龜茲語及其他婆羅謎文字題記內容簡報》，《唐研究》20: 411–438。

吉田 豊 Yoshida Yutaka

1998 “Sino-Iranica”，《西南アジア研究》48: 33–51。

2003 “Appendix” [to Valerie Hansen, “New work on the Sogdians”], *T'oung Pao* 89/1–3: 159–161。

2006 《コータン出土 8–9 世紀のコータン語世俗文書に關する覚え書き》。神戸：神戸市外國語大學。

2011 《ソグド人とソグドの歴史》，曾布川寛、吉田豊編《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7–78。京都：臨川書店。

余 太山 Yu Taishan

2003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5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北京：中華書局。

2012 《塞種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5 《貴霜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余 太山 Yu Taishan（編）

1995 《西域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章 巽 Zhang Xun

2008 《法顯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朱 麗雙 Zhu Lishuang

2017 《于闐國授記》所載早期于闐王統研究》，孟、朱（編）2017: 197–213.

朱 玉麒 Zhu Yuqi

2017 《內藤湖南未刊稿《龜茲左將軍劉平國碑考證》研究》，孟、朱（編）2017: 339–357.

【附記】感謝荒川正晴教授於 2013 年組織召開“ユーラシア東部地域における公文書の史的展開：胡漢文書の相互關係を視野に入れて”（大阪大學，9 月 21–22 日）並有幸共襄盛舉。由於筆者當時提交論文《吐火羅語官文書：龜茲語通行許可證與其它》已經改寫並獲得發表（慶 2013d），茲另起爐灶，從大環境重新思考唐代以前的龜茲文書傳統，陳述若干研究設想與心得，以求教於專家學者。惟本文重點在於討論龜茲地區境內書寫文化的萌蘗而非古代族群遷徙，因此這裡所謂龜茲人不限於中古時期以龜茲語（吐火羅 B 語）為母語之族群。學界通常認為後者在定居龜茲地區並開始書寫其語言以前有所遷徙，惟具體路徑與定居年代仍處於爭議，尤其是其先祖如何與其他印歐語族群分離，又如何與印度—伊朗語族和非印歐語族互動。有關議論參見 Pinault 2002b, Sims-Williams 2002 等眾多著作，此不贅。